

CERI

长江教育研究院

Changjiang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教育智库

Thinktanks

2026年04月刊

总第92期



P01 卷首语：

朱永新：以“六个坚持”引领“十五五”教育高质量发展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 01 以“六个坚持”引领“十五五”教育高质量发展
朱永新

专题聚焦：“十五五”教育强国建设的领域布局与战略重点

- 04 面向“十五五”，基础教育改革的重点与热点
顾明远
- 11 “十五五”时期教育规划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思考与建议
周洪宇
- 24 “十五五”时期职业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维度
李剑萍

专题研究：新质生产力驱动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

- 32 一切为了教育新质生产力的萌发——“十五五”时期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之任务、挑战与进路
龙宝新



欢迎与我们互动

目录 Contents

- 51 “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的“位”与“为” 刘来兵
- 63 坚定历史方位与把握历史主动 —— “十五五”时期教育强国建设的使命、挑战与方法 刘远杰

院内动态

- 72 “一会两中心三院”2026年度工作计划部署会成功召开
- 74 《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多语种外译出版 中国原创教育理论走向世界
- 77 “三师课堂”写入多地教育年度规划，全学段全学科探索引发关注
- 78 长江教育研究院举办政策咨询报告撰写专题讲座
- 80 喜报！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教授论文入选2025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优秀论文

征稿通知

- 82 《教育治理研究》的征稿通知



欢迎与我们互动

以“六个坚持”引领“十五五” 教育高质量发展

来源 | 《中国教育学刊》2026 年 01 期



朱永新

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
长江教育研究院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个坚持”原则，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更为“十五五”时期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站在从“大国办强教育”向“强国办优教育”转型的历史节点，深入

理解和系统贯彻这六项原则，对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

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筑牢教育事业发展的“定海神针”。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通过主动服务、精准回应国家战略需求的进程，实现了从穷国办大教育到大国办强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十五五”时期，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深刻变化的教育发展格局，必须将党的领导贯穿于教育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确保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在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各个环节落地见效。要坚持立德树人，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

要坚持人民至上，让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十五五”时期，要进一步推进教育优质均衡，缩小教育的区域、城乡和校际差距，关注留守儿童、随迁子女、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的教育权益保障。要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和老龄化趋势，拓宽人才成长通道。要加快构建“人工智能+”教育模式，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更广泛人群。要回应人民群众教育关切，提升校内教育教学质量，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构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教育体系。“十五五”时期，要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布局，根据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动态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急需人才。要推动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培养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建设未来学习中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要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加快建成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教育中心，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

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激发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十五五”时期，

必须拿出更大勇气和智慧，突破制约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进一步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基于章程的现代学校制度。要创新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新模式、新路径。要推动教育数智化战略行动，做强做大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个性化学习、精准化教学、智能化管理，以技术赋能教育变革。

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营造充满活力的教育生态。“十五五”时期，在坚持教育公益性的前提下，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共建共享的教育发展格局，引导民办学校注重社会效益，提供多样化、特色化的教育服务。要大力培育教育服务新业态，加强新兴教育领域的标准制定和监管。要进一步创新教育治理方式，建立健全校家社政协同育人的治理机制，发挥教育类社会组织在行业自律、标准制定、评估监测等方面的作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生态。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教育领域风险防线。“十五五”时期，要树立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教育领域各类风险挑战。要加强教材、课堂、网络等阵地建设和管理，维护教育领域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要完善校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常态化开展生命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健全校园欺凌、暴力事件预防和处置机制，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要密切关注教育领域可能出现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如教育债务、就业压力等。要加强教育数据安全，保护师生个人信息安全。

“十五五”时期的教育发展，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交汇点上。以“六个坚持”为指引，我们必将能够把握历史主动，应对风险挑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教育现代化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顾明远

面向“十五五”，基础教育改革的重点与热点

来源 | 《中国基础教育》2026年第3期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顾问委员会主任 顾明远

2026年是全面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的关键之年，也是部署谋划教育“十五五”规划的开启之年，社会各界对基础教育“十五五”期间的发展充满期待。2026年2月，本刊再次专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先生，就一年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纲要》部署取得的成绩，以及“十五五”期间基础教育的改革重点等话题进行交流。

关注一：“十四五”取得骄人成绩，要让强国建设步伐更坚实

《中国基础教育》：顾先生您好！2025年初《纲要》印发后，您接受我们采访，谈了落实《纲要》要关注的几个教育热点问题，文章发表后引起广

泛关注。回顾这一年来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顾明远：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是《纲要》开启之年，基础教育在这一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这一年，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得到深入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取得重要进展，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教育综合改革持续深化，县域普通高中正在振兴，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水平进一步提高，免费学前教育逐步推进，人工智能教育有了新的进展，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有较大改善，教师队伍建设取得积极成效，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成就。

关注二：推动农村教育发展，要把县中办好

《中国基础教育》：“民生为大、基教为先。”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年上半年还将召开改革开放后第三次“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各地在规划制定和落实中应该特别关注哪些方面的问题？

顾明远：做好“十五五”规划编制、筹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是今年教育领域的两件大事。在此背景下，我认为未来一个时期基础教育要从多方面发力，其中首先要推动农村教育发展。

当前，农村教育仍是我国教育的短板，没有农村教育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教育现代化。发展农村教育，首先要把县域普通高中（以下简称“县中”）办好。县中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乡村振兴要靠人才，人才培养要靠教育。只有县中办好了，才能带动农村义务教育的巩固和发展，农村的孩子才能在县里上优质的学校，从而涌现出更多优秀学生，促进更多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2025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出5大任务、8大行动、24条具体举措，各地应按照要求认真落实，充分激发县中振兴的动能，提升县域教育质量，培养更多优秀学生。《行动计划》提出要“开展综合高中建设试点”，高中课程设置要丰富多样、可供选择；《纲要》强调要促进“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这是未来教育发展的趋势。

县中学生高中毕业后不可能都考上大学，即使考上大学后也会选择不同专业，高中应该为不同发展方向的学生提供成长支持。未来，高中阶段教育应该进一步促进普职融合，办好综合高中，让学生都有机会上普通高中。我认为，职业高中要主动与相关产业合作，那些学生毕业后就业有保障的职业高中会办得越来越好，并向高等职业院校发展，而办学质量一般的职业高中会逐渐消亡。我们要让所有学生都有机会进入普通高中，“愿上尽上”，“后进生”与优秀的同学一起学习，学有榜样才有可能逐渐进步。

普通高中的课程设置要多样化，以课程多样化支撑学生个性化发展。为此，可以设置不同大类模块，如理工类、技术类、经济类、文学类、艺术类等模块的课程，适应不同学生发展的需求，使人人都有成才的机会。

要加强农村教育现代化建设，其关键在于提高农村教师的专业水平。城市的优质学校要对农村学校进行帮扶，尤其要有计划地长期帮扶，这不仅能提高农村教师课堂教学水平，还能反向促进城市教师深化对教育的认识。地方政府也要为农村教师改善生活条件，让教师能安心教学，不断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关注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要把师范院校办好

《中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的确是推动农村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其实不仅仅是农村教育需要好老师，所有的学校都需要好老师。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顾明远：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有优质的教师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

一方面，要把师范院校办好。要从国家层面推行开放式教师教育（非师范院校参与的多元化教师教育模式），所有高等教育院校都可以参与培养教育人才，我特别希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能够培养中小学教师。然而中国基础教育体量大，教师队伍庞大，因此，当前仍需建设好师范院校，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综合大学参与。

2023年，教育部推出国家优秀中小学教师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国优计划”），

这是培养高水平专业化教师的重要举措，我希望接受“国优计划”的“双一流”高校重视这项光荣任务，培养出一批高水平、专业化教师。但是仅依靠“国优计划”还无法满足中小学 1595 万教师的培养需求，还要加强师范院校体系建设，把地方师范院校办好，增加其公费师范生的名额。

要加强对师范生的思政教育、师德师风教育；要加强学科和师范课程建设，让他们掌握扎实的学科知识；要让师范生深刻认识到教师的职业特点和历史使命；要加强教育实习，培养师范生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儿童的思想感情。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新教师的培训。近年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培养的一批老教师逐渐退休，教师队伍更新加速。而新教师要经过不断锤炼和学习才能逐渐成为优秀教师。当前，数字化、人工智能已渗透到教育领域，教师要拥抱新技术、学习新技术，赋能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师要认识到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优势和可能带来的风险，同时要认真学习、科学合理地运用新技术。

关注四：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要让孩子有激情

《中国基础教育》：是的，教育者要转变教育观念，改进教育模式和教学方式；要认识新时代、顺应新时代，培养新时代需要的人才。那么，教育教学改革要向哪里走？

顾明远：当今时代最大的特征是创新。未来，教育会遇到许多不确定因素，只有创新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要从过去关注教师的“教”转向关注学生的“学”，把传授知识变为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要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爱好。

清华大学“钱学森班”是郑泉水院士倡导主持的培养高新工程技术人才的实验班。实验班一开始选拔的是成绩优异的学生，几年以后发现考试成绩优异的学生并非最有发展前景。郑院士认为，最有发展前景的学生需要具备 5 个核心素质：内生动力、开放性、坚毅、智慧、领导力。他特别关心基础教育，写了不少文章支持改革基础教育的培养方式。因为他发现不少大学生进入大学后很迷茫，不知道为什么上这所大学、学这个专业，对学习没有兴趣，搞研究也没有激情。他说，“没有激情就没有创造”。

我认为，郑院士的观点就是教育改革的路径：幼儿阶段要呵护儿童的好奇心，小学阶段要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中学阶段应该培养学生志趣，让他们树立志向，只有这样，学生进入大学才会对所选择的专业有激情。当前，要改变“80%的学生陪着20%的学生学习”的状况，让每个孩子对学习有选择权，能够有兴趣地、有效地学习。

关注五：适应学龄人口变化，要逐渐实行小班化教学

《中国基础教育》：说到学生，让人想到一个目前大家特别关注的话题——当前学龄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对此您认为应该如何应对？

顾明远：我国人口近几年呈现城镇化、老龄化、少子化现象，要根据人口的变化调整教育资源的供给与配置。从区域来看，要加强县城中小学的配置，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从学校的设置来看，小学要相对集中，但离乡镇较远的小学应保留一、二年级，三年级以上可并入乡镇中心寄宿学校。一、二年级学生年龄太小，不宜寄宿在学校，三年级以上会好很多。但要办好寄宿学校，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教学能力，还要有爱心、细心、耐心，尽量让孩子感受到在家一样的亲情温暖。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趋势，要逐渐实行小班化教学，实行个性化教育，更好地发掘每个孩子的潜能。个性化教育与个别化教育是有区别的。个别化教育是面向同一个目标对不同孩子进行个别辅导。个性化教育则是根据孩子不同的天性和特长，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促进其多元发展。小班化教学有利于个性化教育的实施。实行小班化教学以后还要保障教师的编制，并不断提高其教书育人能力。

关注六：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要进行学制改革

《中国基础教育》：学龄人口减少、教育资源优化的情况下，国家是否可以提供更长年限的义务教育？有意见提出，希望到2035年，能够逐步实行12年义务教育，对此您有哪些感受？

顾明远：我国现行的基础教育阶段学制还是100多年前就实行的“六三三”学制，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儿童发展的现状，应根据实际需求推动学制改

革。高中阶段实行普职融合，课程设置多样化、模块化，我建议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允许学生学完十年级后参加高考。高考也要进行相应改革，如实施分类考试，加强考试的区分度，以满足学生不同发展方向的选择。

关注七：抓住综合改革“牛鼻子”，要更新教育观念

《中国基础教育》：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进行学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需要综合改革。您认为当前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牛鼻子”是什么？应该关注哪些重点领域？

顾明远：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牛鼻子”是教育观念的更新。现在大家都说教育要回到原点，影响教育的各种张力应该有向心力，但事实上却出现了不少离心力。教育的原点在哪里？在立德树人。但现在有的张力失衡——教育与社会上的教育价值观失衡、学校与家长的教育观失衡、公平与效率失衡、知识和能力失衡，等等。

破解这些张力的失衡问题，首先要在教育观念上寻求统一，在制度上加以改进。现在我们提倡家校社协同育人，这就要求家庭、学校、社会在教育观念上有重大改变，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质量观；在评估制度上进行改革，建立多元的评价制度；在治理上给予学校更多自主权，激发学校改革的热情；改进教育方式方法，以学生为主体，激发学生学习的内生动力。学校和教师在当前的教育生态中，不管受到哪些外部因素影响，都要把握好教育的定力，遵循教育规律，不忘初心、守正创新，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教育智慧，因材施教、因时施教、率性施教，努力培养出社会所需的人才。

关注八：促进家校社协同育人，要县县都有“教联体”

《中国基础教育》：您刚才提到“协同育人”，我们也关注到，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提出，“到2027年所有县全面建立‘教联体’”，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顾明远：教育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活动，教育成效受到各种力量的影响，

因此要提倡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是以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为目标、以学校为圆心、以区域为主体、以资源为纽带，促进家校社有效协同的一种工作方式。吸收家庭特别是社会教育资源，共同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键在于要共同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质量观，心向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要集中力量把学校办好，并丰富学生校外生活，让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

关注九：促进教育公平，要探索外来人口子女教育更优解

《中国基础教育》：在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当前很多外来人口子女在考试和升学中依然面临一些现实障碍，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顾明远：外来人口为流入地建设付出了劳动，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子女将来也不一定回到农村老家，可能会是未来的新市民，这些孩子应该享受与父母工作所在的城市市民同等的教育待遇。因此，我认为中高考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限制，这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路径。当然，这不是教育的单一问题，而是与户籍等制度改革相关联，但我们应该有勇气、有信心、有智慧去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关注十：教育要更加开放，要种下和平的种子

《中国基础教育》：当下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是否要继续推进教育国际交流合作？

顾明远：教育是国家开放的重要窗口，是互创、互鉴、互享的重要举措。教育是和平的种子、国际理解的桥梁。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教育要更加开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通过交流与合作，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讲好中国教育故事，让国际社会更深入了解中国，同时也促进我们了解国际教育发展趋势，学习先进经验。

周洪宇

“十五五”时期教育规划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思考与建议

来源 |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兼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 周洪宇

一、“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基础与形势研判

站在“十四五”圆满收官与“十五五”扬帆启航的交汇点上，科学谋划未来五年教育事业的发展蓝图，首要任务在于精准研判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这既需要对“十四五”时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进行系统总结，更需深刻洞察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及其对教育提出的新使命、新挑战。

(一)“十四五”时期教育现代化迈上新台阶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起步阶段。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为迈向教育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一，普及化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2021 年的 57.8% 稳步提升至 2023 年的 60%，正式进入普及化发展阶段并持续稳定发展，在学总规模超过 4700 万人，稳居世界第一。通过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扩招 3.8 万人，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优质高等教育的关切。这五年还新增普通本科高校 18 所、职业本科 70 所，增加本科招生 70 万人；推进国际合作办学，新增 540 多个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新增学位供给 35 万。

第二，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累计向社会输送 5500 万人才，毛入学率从党的十八大前的不到 30% 到现在超过 60%，提高一倍多。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10.9 年增加到 11.3 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过 14 年。每年高校输送的理工农医类毕业生超过 500 万人，全球领先，高技能人才超过 7200 万人，为增强经济发展韧性构筑了坚实的人才根基。

第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能力显著增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格局初显。“十四五”期间，全国高校牵头获得 75% 以上国家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55% 以上科技进步奖，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源头作用。学科专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新增本科专业布点 8600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4500 余个，紧密对接科技前沿与产业升级需求。教育支撑科技、科技反哺教育、人才贯通培养的正向循环加速形成，制度效能日益显现。

（二）“十五五”时期教育发展面临深刻复杂变化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布局的关键窗口期，也是教育强国建设由立柱架梁转向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核心攻坚期。然而，这一时期的国内外环境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教育发展既面临重大战略机遇，也须应对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

从国际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为我国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

造外部环境提供了可能。但同时，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治理赤字加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明显增强。这对我国教育的自主创新能力、拔尖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以及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国内看，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将更加凸显。然而，有效需求不足、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提出新课题等挑战依然存在。特别是学龄人口呈现显著的“排浪式”波动特征：学前教育学龄人口高峰已过，初中学龄人口在 2026 年达到峰值，高中学龄人口高峰预计在 2029 年到来，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在 2032 年达峰。这一变动曲线对各级各类教育资源的配置形成巨大挑战，迫切要求教育发展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提升。

面对复杂形势，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当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渐向“人才红利”转变，教育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创新创造动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标志着教育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与功能期待，教育规划的核心命题已超越单纯的目标分解，而在于如何以顶层设计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二、“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方向与政策建议

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与创新第一动力的核心交汇点，高等教育在“十五五”时期承载着引领教育体系变革、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的关键使命。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亟须持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以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一）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布局，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在区域布局优化方面，我国要形成与国家战略空间布局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新版图。支持建设一批办学质量过硬、行业特色鲜明、学科优势突出的地方高校，引导其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找准定位、办出特色。综合考虑各省人口普查数据和学科战略匹配度等因素，在“十五五”至“十六五”期间，加大对部省合建高校的支持力度，填补区域高等教育布局的薄弱缺口。新增高等教育资源适度向人口大省和中西部地区倾斜，缩小区域间高等教育发展差距，增强高等教育服务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能力。

在层次结构优化方面，我国要构建梯度合理、功能互补的高等教育体系。启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自主科学确立“双一流”建设的中国标准，以标准牵引改革。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高校范围，重点支持一批办学底蕴深厚、学科优势突出、服务发展成效显著的高水平大学进入建设行列，将优势学科及贡献超过多所现有“双一流”高校的学科纳入建设范围。坚持严格标准、强化绩效、能进能出的原则，完善“双一流”建设遴选机制，建立健全透明合理的“准入—建设—评价—调整”全周期管理体系。同时，加大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支持力度，引导其坚守“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的办学特色，在夯实基础研究的同时，构建“需求牵引—技术研发—成果孵化—产业应用”全链条协同机制。

在规模结构优化方面，我国要稳步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数据显示，近两年“双一流”高校扩招3.8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应继续适度扩大优质本科招生规模，“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增量计划应重点投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国家战略急需的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在研究生教育方面，依据《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的战略部署，研究生在校生规模需从2023年的388万人稳步提升至2035年的750万人。国家在“十五五”期间，应优先支持“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具备条件的省属重点高校扩大招生规模、获批

博士点；在“十六五”期间，应逐步推动一般本科院校及具备资质的民办高校有序参与研究生培养，形成梯度合理、层次分明的人才培养格局。

（二）深化高等教育分类改革，引导高校特色发展

“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是引导高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在不同赛道追求卓越，避免同质化竞争。国家要坚持分类推进的改革思路，引导和推动高校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发展方向，明确发展目标与路径，支持理工农医、人文社科、艺术体育等高校差异化发展。

研究型高校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其组建大团队、承接大项目、开展大攻关，加快构建“需求牵引—技术研发—成果孵化—产业应用”全链条协同机制；深化科研体制改革，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加强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等重大科研平台建设，推动科研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提升科研创新的体系化能力。

应用型本科高校要坚持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发展方向，紧密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健全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围绕区域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及时撤并改造落后专业，增设紧缺领域专业；深化与行业龙头企业的合作，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实习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项目与生产任务深度融入教学标准，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完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岗位胜任力与创新能力。

职业本科高校要突出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完善“中职—高职—职教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通道；优化与区域发展相协调、与产业布局相衔接的专业布局，推动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实行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育人机制，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本科高校；加强实训基地建设，提升实训设备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在分类改革的同时，国家要

深化高校内部治理改革；完善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深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在学科专业设置、师资招聘、经费使用等方面给予高校更大自主权；优化高校内部管理架构，精简行政机构，提升管理效能，让教师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教学科研工作；加强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健全学术权力运行机制，保障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

（三）加强学科专业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学科专业建设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十五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必须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深化学科专业改革，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学科专业体系。

在学科建设方面，高校要优先发展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紧密相关的学科专业，纵深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大力发展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启动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可控核聚变、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脑科学与类脑研究等前沿领域，打破学院、学科壁垒，实行实体化运作与矩阵式管理；创新交叉学科中心的组织模式与运行机制，推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赋予中心在人才引进、经费使用、评价考核等方面更大自主权；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加大对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的支持力度，夯实科技创新的基础；完善学科评价机制，打破单一评价标准，实行分类评价，引导不同类型学科特色发展、争创一流。

在专业建设方面，高校要建立健全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全面提升高校学科设置与国家战略需求的适配度；定期发布区域优先发展和暂缓发展的指导性学科专业清单，完善国家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专业的超常设置机制，实现学科专业与产业链、创新链同频共振；充分运用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平台，常态化监测学科专业建设成效，建立“红黄牌”动态提示与预警制度，推动就业与培养良性互动，形成需求导向、特色发展、竞争择优的学科生态；深化专业内涵建设，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加强教材建设，提升专业建设的规范化水平。

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高校要聚焦学生全面发展，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深入推进“强基计划”，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加强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战略急需领域本硕博衔接培养。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推广探究式、项目式、合作式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扩大创新创业实践平台覆盖面，健全专创融合、协同育人机制，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与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完善学生评价机制，优化平均学分绩点制度，建立健全过程评价与增值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机制，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从以知识传授为主向能力素质并重的系统性跃迁。

（四）强化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提升服务创新能力

“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必须深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强化科教融汇、产教融合，提升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在科教融汇方面，我国要推动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协同创新，形成创新合力；完善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合作机制，促进科研资源共享、科研人员互聘、科研项目共建，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高校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跨学科、跨领域协同创新；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招生指标向重大科技任务承担单位倾斜；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制度，明确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提高转化收益中给予科研人员奖励的比例，激发高校教师从事应用研究与成果转化的内生动力；建设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网络体系，支持高校联合地方政府、科研院所、头部企业共建概念验证中心与中试熟化基地，为早期科技成果提供原理验证、技术可行性分析与市场前景评估。

在产教融合方面，我国要深化校企合作，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新生态；持续创新市域产教联合体实体化运作模式，推动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共建共享高水平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全面推行中国特色学徒制，支持行业龙头企业与高校联合制定岗位技能标准，共同开发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建立产教融合

型企业认证制度与组合式激励政策清单，对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激励，激发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内生动力；加强高校与行业头部企业的合作，共建现代产业学院，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推动高校教师常态化参与企业技术革新、工艺改进及产品升级实践，着力提升教师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与产业适配度。

在服务区域发展方面，我国要引导高校立足区域实际，发挥学科专业优势，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支持高校参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围绕区域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等重大问题开展研究，提供决策咨询、技术支持、人才培训等服务；深化高校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共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推动科技成果在区域内转化应用；实施高校服务县域经济发展行动计划，支持高校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技术成果转化推广，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夯实发展根基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其专业素养与育人能力直接决定高等教育的质量底色。“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必须全面深化教师教育改革，培养造就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高校教师队伍。

在教师培养方面，我国要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支持更多高水平大学开展教师教育，系统化开展教师培训，全面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与教书育人能力；完善教师资格制度，提高教师资格准入学学历标准，将修习教师教育课程、参加教育教学实践作为取得教师资格的必备条件；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加快提升我国高校教师学历层次，推动高校将博士后作为专任教师的重要来源；加强青年教师培养，实施青年教师能力提升计划，通过岗前培训、在职研修、导师指导等方式，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支持青年教师到企业、科研院所挂职锻炼，丰富实践经验，提升服务社会的能力。

在教师引进方面，高校要坚持引育并举，汇聚海内外优秀人才；实施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围绕国家战略急需领域和学科发展需要，引进一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完善人才引进机制，简

化引进程序，提供安家费、科研启动经费、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全方位支持，为引进人才营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健全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建立高层次人才移民制度，引育国际优秀人才；同时，注重本土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为本土人才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平台，激发本土人才的创新活力。

在教师评价与激励方面，高校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破立并举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开展以成果原创性和学术价值为主的基础研究评价，优化国际同行评价。赋予用人单位更大人才评价自主权，防止简单以称号头衔确定薪酬待遇、配置资源；完善教师薪酬分配制度，健全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联系的分配激励机制，向教学一线、关键岗位、优秀人才倾斜；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明确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完善各级各类教师入职查询和从业禁止制度；将师德师风教育贯穿教师管理全过程，严格落实师德考核第一标准，实行档案全覆盖。

（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

“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要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融入全球教育格局，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在“引进来”方面，我国要高质量引进全球优质教育资源；加快建强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岛，推动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提质升级，鼓励更多海外知名高校在琼依法依规开展独立办学，支持国内教育教学机构在琼拓展国际合作，打造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扩大高等教育领域对外开放，有序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优化留学生生源结构，提升留学生培养质量。深化与海外高校及科研机构战略合作，开展联合办学、联合科研、师生交流等合作项目；引进国际通行的职业标准与资格证书体系，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管理经验，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在“走出去”方面，我国要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标准、课程模式与评价体系走向世界；依托高水平大学建设一批国际合作创新学院与海外校区，推动中国教学模式、课程体系的整体输出；深化“留学中国”品牌建设，完善来华留学生从招

生培养到就业创业的全链条服务与管理机制，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吸引力；实施“中国学术海外传播”重大工程，遴选一批高水平原创著作进行多语种翻译出版，设立国际出版资助与推广项目，推动中国学术成果进入国际主流传播渠道；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三师课堂”等教育创新模式国际化应用，开发国际版技术平台与多语种教学资源包，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示范性智慧教室，输出课堂组织变革的中国方案。

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国家要深化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战略合作；加强在全民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教师教育等全球议程中的深度合作，设立专项合作基金，支持共同开展国际教育政策比较研究与全球教育数据监测；依托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新建一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类中心与教席，在职业技术教育、STEM教育、学习型城市建设等领域形成具有全球辐射力的研究网络与知识生产平台；积极参与国际教育大会、部长级圆桌会议及重要规则磋商，主动承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与国际教育论坛，增强在关键议题上的议程设置能力与方案输出能力；支持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组织工作、担任重要学术职务，推动国际学术期刊设立专题栏目，提升中国学人在全球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与议程设置能力。

三、“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与支撑体系

“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明确的发展路径，更需要系统完备的制度保障。我国必须从体制机制改革、资源配置优化、数字化赋能、质量文化建设和评价监测体系等方面构建支撑体系，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释放高校办学活力

体制机制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基础。“十五五”时期，我国必须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为动力，破除制约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1. 完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

我国应推进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向高校下放人事管理、职

称评审、薪酬分配、科研立项等方面的自主权，赋予高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和发展空间；优化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明确党委与行政的职责边界，形成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治理格局；加强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建设，保障学术权力独立运行，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

2. 创新高校编制人事制度

我国应建立符合高等教育特点的人事管理制度，推行人员总量管理，打破编制身份壁垒，实现固定岗位与流动岗位相结合、专职与兼职相结合；完善高校教师聘用机制，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激发教师队伍活力；探索实施高校职员制度，建立管理岗位职员等级晋升体系，拓宽管理人员职业发展通道；深化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提高后勤服务专业化水平。

3. 健全多元筹资机制

我国应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经费的高等教育投入机制，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物价变动指数、财力状况相适应的高校生均拨款动态调整机制；优化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结构，加大对基础学科、交叉学科、教师队伍建设等重点领域的倾斜力度；完善学费动态调整机制，建立与居民收入水平相适应的学费标准调整机制。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设立基金、合作办学等方式参与高等教育，扩大高等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完善高校基金会运作机制，提升社会筹资能力。

（二）加快教育数字化赋能，塑造高等教育发展新优势

教育数字化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引擎。“十五五”时期，必须抢抓数字化发展机遇，以教育数字化塑造高等教育发展新优势。

1. 建设高等教育数字化基础设施

我国要加快高校网络基础设施升级，完善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整合优质课程资源、教学案例、实验实训资源，为高校师生提供一站式学习服务；推进高校教学科研设施数字化改造，建设虚拟仿真实验室、智慧教室、智能图书馆

等新型教学科研空间；加强教育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统一的教育数据标准和数据共享机制，打破数据孤岛，释放数据价值。

2. 深化教育教学数字化变革

我国要推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等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推广“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场景，开发智能教学助手、智能学伴、智能评价系统等，为师生提供个性化、智能化教学服务；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体系，开发一批高质量在线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数字化教材等，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供给；建立数字化教学质量保障机制，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教学过程进行实时监测和智能分析，提升教学质量。

3. 提升师生数字素养能力

我国要将数字素养纳入教师专业发展标准，建立教师数字素养培训体系，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开展学生数字素养教育，将数字素养课程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学生的数字思维、数字技能和数字伦理；建立师生数字素养评价机制，定期开展数字素养测评，推动师生数字素养持续提升；加强教育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既懂教育又懂技术的复合型数字化人才。

（三）健全评价监测体系，提升高等教育治理效能

评价监测是高等教育治理的重要手段。我国必须建立科学、规范、透明的评价监测体系，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1. 完善高等教育评价制度

我国要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坚决破除“五唯”顽瘴痼疾，建立以立德树人成效为根本标准，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为多维评价指标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实施高校分类评价，针对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设计差异化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引导高校分类发展、特色发展；完善学科评价机制，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学科评价体系，引导学科高质量发展。

2. 建立高等教育监测预警机制

我国要构建覆盖高等教育全过程、全要素的监测指标体系，常态化监测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建立高等教育发展预测模型，对学龄人口变化、人才供需状况、就业形势等进行预测分析，为高等教育规划调整提供依据；完善高等教育风险预警机制，对办学风险、质量风险、安全风险等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提高高等教育风险防控能力；建立高等教育国际比较监测机制，跟踪分析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位次，明确发展方向。

3. 强化评价监测结果运用

我国要建立评价监测结果反馈机制，及时向高校反馈评价监测结果，帮助高校发现问题、改进工作；完善评价监测结果与资源配置挂钩机制，将评价监测结果作为财政拨款、招生计划、学位授权、项目评审的重要依据；建立评价监测结果公开机制，定期发布高等教育发展报告、质量报告、评价报告等，引导社会合理预期；加强评价监测队伍建设，培养一批专业化、职业化的评价监测人才，提升评价监测的专业水平。



李剑萍

“十五五”时期职业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维度

来源 | 《教育研究》2026年第3期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李剑萍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与产业转型升级紧密对接的类型教育，肩负着支撑国家战略、赋能实体经济、促进协调发展的重要使命。其发展必须以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根基，以强化产教科教协同为动力，以优化布局结构为支撑，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自身更高质量发展。

一、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建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首要位置。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则是融入并服务于这一宏观体系的重要子系统。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整体框架下认识、定位、谋划、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推动产业大体系与职业教育子体系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既是高质量建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要求，也是产教融合走向纵深的高级形式与高级标准。

（一）立足传统产业优化提升与先进制造业发展，升级改造职业教育专业群与课程群

实体经济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柱，《纲要》明确要求“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坚实底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长期积累形成的产业家底，也是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核心优势所在。传统产业并非落后产业，通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技术赋能，可以有效实现高质量转型升级。新一轮产业变革既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也为职业教育优化专业结构、升级课程体系、创新育人模式提供了新机遇。

第一，深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机制改革，构建与产业变革相适应的产教融合新模式。职业教育的核心特征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产业既是职业教育的服务对象，也是职业教育的资源依托，二者唇齿相依、共生共荣。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产业结构、行业形态、企业组织方式发生深刻变化，职业教育必须顺势而为、因势而新，持续完善以教育部门为主导、行业企业为主体、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等多元发展的办学新格局，推动办学体制、治理结构、育人方式与产业发展同向同行。第二，瞄准重点产业集群，实施大规模、滚动式专业群改造升级行动。围绕矿业、冶金、化工、机械、建筑、船舶、轻工、纺织等传统优势产业，紧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方向，推动专业群建设精准对接产业群发展，重点服务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全面支撑制造业数智化转型、重点产业链强链补链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第三，系统推进课程群、新型教材与实习实训基地一体化建设，夯实专业群发展基础。课程是专业的基本组成单元，课程群建设是专业群发展的根基。夯实专业群发展基础必须同步推进课程内容更新、数字化教材开发、实习实训条件升级与“双师型”队伍建设，将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要素全面融入教学过程，全面提高人才培养与产业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升级的适配性。

（二）聚焦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与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拓展职业教育新专业新方向

“十五五”时期，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实现集群化、规模化发展。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与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将进入前瞻布局阶段，有望形成爆发式经济增长点，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快速崛起，深刻改变了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结构与岗位形态，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与“黑灯工厂”加速普及进一步挤压传统技能岗位空间，使职业教育面临培养定位、结构适配、价值实现的根本性拷问，也倒逼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与专业布局的加速重构。

第一，深刻把握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律，推动专业布局主动识变、科学应变。无论新兴产业还是未来产业，均以先进制造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为底层基础，其发展本质上是对高端装备、智能系统、集成技术的更高层次需求。职业教育须牢牢守住先进制造业专业群根基，既在稳定核心专业的基础上实现前瞻性布局，又避免盲目跟风与资源浪费。第二，深化数字制造与人工智能时代人才培养规格认识，重塑技术技能人才能力标准。人工智能在替代部分岗位的同时，也创造出大量设备运维、系统调试、数据应用、场景运营等新岗位，人才需求从单一操作型人才向复合技术型、数字技能型人才转变。职业教育必须及时调整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与评价标准，培养适应数智化生产场景的新型技术技能人才。第三，坚持走融合化专业群建设道路，破解专业建设滞后于产业发展的现实矛盾。通过“老树新枝”在传统专业中孵化新方向、“专业嫁接”推动跨领域交叉融合、“专业融通”创新学籍管理与学分机制等方式，实现专业动态调整与资源高效配置，既降低产业发展不确定性带来的人才培养风险，又提升专业体系对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快速响应能力。

二、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培养技术技能型创新人才队伍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引领、以产业创新为实践载体，其本质特征是实现由传统资源要素投入驱动向科

技创新引领驱动的系统性转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既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路径，也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必须依靠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术技能型创新人才队伍。技术技能型创新人才兼具技术应用能力、实践创新能力与产业适配能力，是打通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的关键纽带，也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与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性、战略性力量。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结合极为紧密、与市场需求对接极为直接，在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养技术技能型创新人才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一）创新产教融合体制机制，提升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力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立身之本、活力之源，也是职业院校对接产业发展、提升办学质量、增强服务能力的根本路径。随着传统产业加速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快速成长，传统产教融合模式在稳定性、协同度、适应性等方面面临新的挑战。当前，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实践运行中，存在产业快速迭代带来的发展不确定性增强、产业区域转移导致的布局波动、产业链重构引发的结构冲击等问题。教育体系自身的超稳定态与产业快速变革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职业院校只有创新产教融合体制机制，全面提升关键办学能力，才能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其一，做强做优市域产教联合体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充分发挥政府统筹协调、行业精准引领、企业深度参与、院校重点推进等多元主体作用，推动资源整合、要素流动、供需对接，提升产教融合的稳定性、长效性与实效性，有效应对产业转移、结构调整带来的冲击。其二，充分激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市场活力。实践证明，只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才能调动更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积极性，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也才会有更大空间。要以市场为导向，加快构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国家制度体系，包括优化产教融合的管理制度，建立职业教育产权保护制度，完善企业公共技能培训补偿制度等。其三，有效夯实职业院校稳健发展的底层办学能力。把党的全面领导、内部治理体系、战略规划能力、师资队伍建设、开放办学格局作为最基础、最核心、最持久的能力来抓，主动适应人口变动、人工智能发展、就业形态变革、国际格局调整等重要趋势性变量，以外部变革力量激发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办学韧性与发展后劲。

（二）深化科教融汇育人，培养具备科技素养的技术技能型创新人才

职业教育要真正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就必须把科技素养、创新能力、技术应用能力摆在人才培养的突出位置，推动职业教育从传统技能训练向科技赋能、创新引领的现代化育人模式转型。其中，科教融汇是职业教育提升科技承载力、培养技术技能型创新人才的关键路径。从现实条件看，职业院校科研基础仍然相对薄弱，资源投入、平台建设、团队力量与普通本科高校存在明显差距。《2024 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数据显示，2024 年全国高职（专科）学校科研经费总量约为 92.99 亿元，其他本科高校科研经费总量约为 1308.11 亿元，高职（专科）学校的校均科研经费仅为其他本科高校校均科研经费的 6.14%。职业院校必须立足类型定位，走以技术应用、工艺创新、成果转化为核心的特色化科教融汇道路，从评价机制、平台载体、师资队伍三个关键维度重点发力。

其一，完善科教融汇评价与激励机制。将科教融汇成效纳入职业院校办学质量评估和“双高”建设考核内容，坚持以人才培养、技术服务、成果转化为核心导向，不设置功利化、竞争性量化指标，坚决纠正“重论文、轻应用、重经费、轻实效”的评价倾向，引导职业院校对接产业企业技术难题开展应用型科研创新。其二，建强“政行企校”协同育人平台。以现代产业学院为重要载体，完善政府统筹、行业指导、企业主体、学校主力的协同机制，健全权责清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运行制度，推动创新资源、技术资源、实践场景全面融入技术技能型创新人才培养全过程。其三，依托科教融汇加强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坚决避免科研与教学“两张皮”现象，推动教师在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工艺改进的过程中提升教学能力。通过在实践中提升育人水平，全面增强学生的技术应用能力、实践创新能力与科技素养，真正培养出适应新质生产力要求、具备现代科技素养的技术技能型创新人才。

三、服务经济社会和区域协调发展，着力优化职业教育布局结构

《纲要》围绕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作出系统部署，强调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区

域协调发展离不开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与高质量教育保障。职业教育在促进就业增收、优化资源配置、畅通要素流动、缩小发展差距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主动服务国家区域重大战略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在优化布局结构、完善体制机制、强化资源保障上持续发力，为实现更高水平、更可持续、更为均衡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力支持。

（一）聚焦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健全职业教育投入保障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必须以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作为重要支撑与实现路径。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既要持续投资于物，更要强化投资于人，将更多资源投向就业培训、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投资于人既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底线要求，也是扩大有效投资、激活居民消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举措。加大职业教育投入，既是职业教育自身夯实办学条件、提升育人质量的内在需要，也是增强职教学生就业竞争力、改善其家庭经济弱势地位、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提升其家庭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更是扩大教育领域投资、深化产教融合、以人才供给支撑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

一是大幅提高职业院校学生奖助标准，健全全覆盖、多层次、精准化的学生资助体系。职业院校学生家庭经济条件整体偏弱，《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2—2022年）》数据显示，职业院校70%以上学生来自农村，2013—2020年累计有800多万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业教育，职业院校中的低收入群体与农村家庭子女占比突出。对此，要提高奖助额度、扩大覆盖范围、优化资助流程，这样既能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引导更多适龄学生尤其是普通家庭子女理性选择职业教育，也能以学生资助为纽带实现对低收入家庭的间接支持，以教育公平夯实社会公平基础。二是优化“双高计划”投入模式，扩大优质职业院校与高水平专业群建设覆盖面。《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24》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22453.04元，其中普通本科学校为25626.29元，高职高专学校为16008.98元。高职院校生均经费仍显著低于普通本科高校，亟须统筹设计职业教育投入保障体系。按照分区域、分类别原则统筹布局优质职教资源，整体提升职业院校办学水平，推进“双高计划”大幅扩容升级，切实办好“少而精”、

“精而优”的中等职业教育，平均每个地级市办好 5 所左右、全国办好 2000 所左右优质中等职业学校。三是完善政策引导与社会荣誉体系，激发企业、行业及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在延续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土地支持等传统激励政策基础上，顺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营造、防止低水平产业内卷的新发展要求，构建体系化、长效化引导政策，重点支持高质量产教融合、产业学院建设、“产业园区+职业教育”融合发展、产教协同“出海”等创新模式，推动产教资源深度整合、协同育人。

（二）助力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扩大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均衡供给

区域协调发展与城乡融合发展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关键着力点，优化高等职业教育区域布局，既是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衡量区域协调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志。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 2025 年 6 月 20 日，全国共有高职（专科）学校 1554 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 87 所。从区域分布看，高职（专科）学校数量在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占比分别约为 34.36%、29.79%、28.25%、7.59%，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数量在四大区域占比依次约为 35.63%、18.39%、40.23%、5.75%。高职（专科）学校和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的区域发展协调性有待进一步提升。中西部、东北地区及中等城市是我国职业教育优化布局、提质增效的重点区域，需要以战略导向完善资源配置与发展保障机制。

一是实施中西部、东北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促进计划。在院校设置、“双高计划”建设、职业本科院校布局及各类项目中，重点倾斜支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这既为区域内学生提供更充足的优质教育资源，又为区域发展集聚青年人口、注入教育动能，提升产教融合水平和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二是引导省域职业院校向中等城市延伸办学。中小城市是连接城乡、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关键枢纽，其职业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已成为制约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上）数量为 105 个，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50 万以上、100 万以下）数量为 135 个。全国大部分高职院校集中在大城市，设置在中等城市的高职院校较少，中等城市的优质职业教育资源覆盖存在明显短板，亟须推动高职院校建设成为中等城市的

文化中心与科创中心，强化中等城市发展内生动力，服务现代化城市体系建设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三是把握国内产业区域有序梯级转移趋势，科学规划职业教育布局。当前，我国产业布局正处于深度调整与重塑阶段，引导部分传统产业、制造业向中西部及中等城市有序转移，并在转移过程中实现转型升级，既能有效防范产业空心化风险，又能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关键产业备份能力。中西部及中等城市要积极顺应该发展趋势，科学规划职业教育布局，助力职业教育规划与区域产业布局调整相互赋能、协同发展。



龙宝新

一切为了教育新质生产力的萌发

——“十五五”时期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之任务、挑战与进路

来源 | 《中国教育信息化》2026年第1期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师教育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龙宝新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教育强国的新阶段，教师作为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其专业发展状况直接关系着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与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教育改革，我国先后出台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文件，教师教育体系在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十四五”时期更是将“高质量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置于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位置。然而，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人口结构与区域发展格局持续重塑，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深入推进，传统教师教育发展模式与未来教育形态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十五五”时期是我国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被赋予重要的战略意涵。这一阶段不仅是对既有改革成果的承接与深化，更是面向未来的一次系统性再造，其复杂性、艰巨性和前瞻性远超以往任何阶段。

新时期关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论述，越来越多地与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宏观经济和国家战略话题交织在一起。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是新质生产力。与传统“教育生产力”概念侧重教育对人力资本形成的贡献不同，“教育新质生产力”更强调在数字化、智能化背景下，知识、组织与人才形态的深度重组及其对教育系统整体效能的重塑。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教育不再只是补充教师人力资源的制度安排，更是直接参与教育新质生产力生成和演化的关键环节。一方面，教师教育是教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源头系统”。教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是具备高水平专业能力、数字素养和教育创新能力的教师群体，他们不仅是新技术在课堂中应用的实践者，更是将学习科学、认知科学等前沿成果转化为教学行为、课程结构和学习支持系统的“知识转化者”。教师教育能否及时吸纳学习科学、脑科学等领域的新知，能否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内化为教师专业能力结构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新质生产力的总体水平和发展速度。另一方面，教师教育也是教育新质生产力的“制度性基础”。教育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需要以开放的教育体系、灵活的组织形式和高效的治理机制为支撑，而教师教育正承载着这些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功能。无论是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专业发展学校制度，还是“职前—入职—职后”一体化的教师教育体系，不仅关系着教师个人的专业成长，也通过改变教育系统中知识流动方式、学习组织方式和权力配置方式，推动教育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教育治理结构的现代化。

基于此，“十五五”时期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应当被理解为教育新质生产力生成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而不仅仅是教师数量与质量改善的“部门性工程”。在分析教师教育问题时，要从单纯关注师资供需平衡、教师能力提升等传统议题，转向更加关注教师教育如何嵌入国家创新体系、如何推动教育系统的整体性转型，以及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提升教育系统的动态适应能力与变革能力。

一、重点任务：锚定“十五五”时期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明确提出，到 2035 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

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则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教育的使命和任务，提出要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在2024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要“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为此，应将教师教育系统性地嵌入教育强国建设的整体布局中，推动教师教育实现整体性变革与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期间我国教师总数达到1885万人，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并非对既有任务的简单扩容，而是对发展逻辑与制度安排的整体性转向，甚至需要以前瞻三十年乃至更长的眼光来思考未来教育改革发展，并在“十五五”期间为此做好谋划准备。从系统层级来看，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在宏观战略、中观生态、微观培育三个层面协同推进：宏观层面着眼于发展逻辑转换与战略嵌入，中观层面着眼于生态结构重构与共同体建构，微观层面着眼于教师专业形态的代际转换与新质能力生成。

（一）战略重构：从规模供给走向质效牵引的宏观转型

“十五五”时期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从数量优先的扩张式供给逻辑向以质效提升为核心的战略性供给逻辑的范式转变。简而言之，教师教育要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最高位变量，重新界定教师教育的目标功能和结构布局，从教育体系的“后置性配套”转为教育现代化和教育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前置性基础制度”，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中发挥更加基础性、前瞻性的支撑作用。在此意义上，首先要明确教师教育嵌入国家战略的“功能再定义”。长期以来，我国教师教育多被视为基础教育的后端支撑体系，主要围绕满足学校教师岗位需求展开，关注点集中在供给是否充足、学历是否达标等问题上。这种“岗位导向”的教师教育功能定位，在基础教育快速普及阶段曾发挥重要作用，但在教育高质量发展与教育新质生产力生成的背景下，已难以支撑国家战略新要求。

“十五五”时期，教师教育应主动嵌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程，其功能定位亟须从“补位式支持”转向“前瞻性驱动”与“战略性嵌入”。

一方面，要在顶层设计上强化教师教育的战略属性，借助“双一流”建设、教师教育一流专业建设等政策工具，引导高水平大学在教育学科建设、跨学科教师培养、教育研究创新中承担“战略引领者”的角色，将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未来产业与新质生产力支撑、国家安全与公共治理所需人才的教育供给统筹纳入师资规划，将教师教育从教育系统内部的“配套机制”提升为国家人才体系的重要构件。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统筹师范院校与综合大学、中央与地方的功能分工与协同，纠偏于过去以规模、点数、招生数量为核心指挥棒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构建以质量、贡献与影响为导向的复合评价体系，从而在宏观战略上形成以高质量、高效率、高适配为特征的新一轮教师教育发展格局。

在总体数量基本达标的前提下，“十五五”时期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是优化教师供给结构与构建动态调节机制，推动教师教育由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由一般供给向精准供给转型，也是回应人口结构变化、学习方式重构以及新技术加速迭代的必要选择。传统教师教育供给模式建立在相对稳定的班级授课制、学科体系和学校组织形态基础上，而未来教育呈现出跨学科融合、学习场景泛在化、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等趋势，使教师专业角色从单一的教学执行者转变为学习设计者、成长引导师、社会链接者等综合角色。这一变化直接要求教师教育供给在总量上避免“产能过剩”的低效扩张；在结构上加速向紧缺学科、交叉前沿领域、乡村教育、特殊教育等短板领域倾斜；在类型上实现从“单一学科、学段型教师”向“复合型、研究型、创新型教师”的梯度供给。因此，“十五五”期间应以国家层面的教师发展大数据、人口预测模型和区域教育发展规划为基础，构建动态调节的教师教育供给结构调控机制，推动培养规模、学科结构、区域分布与国家教育和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同时，通过改革财政拨款、专业认证和绩效考核制度，弱化以招生规模、论文数量为核心的“量化偏执”，强化教育贡献度、学生发展度和社会公共价值在资源配置中的权重，以制度性激励引导高校从数量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和特色竞争。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教育数字化背景下，如何将新技术与新知识转化为教师教育的新质生产力，是“十五五”时期宏观层面必须回应的另一项任务。在“教育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实施以教育新质生产力为牵引的教师教育创新议程，教

师教育必须完成从传统人力资本培育模式向新质教育生产要素整合模式的战略升级。新质生产力不仅体现为技术层面的数字化、智能化，更涉及知识、组织与人才形态的系统重组。教师教育应主动将 AI、大数据、学习分析、虚拟仿真等技术植入教师培养全过程，通过构建开放的教师教育数据支持体系，实现对教师培养质量的实时监测与循证改进，加快以数据流驱动教师教育质量闭环建设进程。同时，在教师教育课程领域推动技术嵌入、认知重构、组织变革的协同革新，将学习科学、脑科学等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师教育课程知识，重塑教师专业知识结构。通过这一过程，教师教育不仅实现了自身供给方式的数智化升级，更在为基础教育系统输送具备高水平数字素养、学习设计能力与教育创新能力的“新质教师群体”的同时，成为推动我国教育体系整体生产力跃升的重要引擎，从而在更高层面上契合“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要求。

（二）生态再造：多元特色协同的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

如果说宏观战略解决的是教师教育发展的方向性和定位性问题，那么中观生态则关乎其支撑结构和运行机制。“十五五”时期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不可能依托单一机构、单一层级、单一类型办学主体独立完成，必须构建起跨主体、跨区域、跨领域协同的教师教育共同体，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区域特色凸显、制度文化支撑的教师教育生态圈。

在主体层面，从“线性供给”到“协同生态”的教师教育生态观转换，是克服教师教育协同提质瓶颈的重要切入点。传统教师教育大多基于“线性供给”逻辑，即高校培养教师，基础教育学校使用教师，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监管与保障。在这种逻辑下，教师教育主体之间关系相对单向，缺乏深度互动与共建机制，教师教育呈现“分段操作”的特点。“十五五”时期，教师教育必须从“线性供给”逻辑转向“协同生态”逻辑，协同不仅是办学主体的简单叠加，更是以共同目标、协同机制与共享文化为纽带的系统性生态再造。在主体结构上，创新“高校—政府—学校—社会”多元主体协同的跨界协作模式，进一步完善教师教育协同提质进路，继续打造高质量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提升特殊教育教师质量。在功能角色上，通过制度设计与资源配置，引导不同主体在教师教育中形成相对清晰

的角色定位与分工协作，实现各司其职、优势互补与共建共享。师范教育改革持续深化，教师培养层次和质量不断提升，同时将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理工类大学作为未来教师培养的重要来源。师范院校从单纯的培养者转变为区域教师发展中心与教育创新策源地，基础教育学校从“实践基地”转变为教师教育的共同建构者和专业标准的实践检验者，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从单向管理者转变为跨主体协同治理的组织者与整合者，教育企业和社会机构则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场景资源和创新方案，进入教师教育生态的内圈。

在空间层面，构建多元特色协同的教师教育共同体是破解长期存在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失衡问题的关键突破口。从区域协同维度出发，推动以地市或都市圈为单元的教师教育联盟建设。由地方政府牵头、师范院校和优质中小学为核心节点，形成规划共商、基地共建、人才共享、成果共用的协作机制和区域教师教育命运共同体，推动东中西部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优质师范教育资源的制度化流动和组团式输出，打破单向支援、短期帮扶的传统范式，以此缓解区域、城乡间教师教育机会与质量的失衡问题。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是以政治引领为根本、以服务国家战略为指针、以满足实践需求为导向、以多元协同为方法的系统性框架，具有明显的本土气息。体系之“特”，主要表现在坚持思想性与政治性统一、突出战略性与主体性地位、注重实践性与适应性导向、彰显系统性与协同性优势等方面。在共同性之中必须保留并强化区域差异化的正当性与建设性，鼓励不同区域依据自身文化传统、产业结构、人口特征与教育问题域，探索具有地方表征的教师教育模式，进而形成以国家标准为底线、区域特色为亮点、协同机制为支撑的模式谱系，教师教育共同体不仅在空间上实现联动，更需在实践中实现“多样统一”的结构优化。在实践层面，推动制度协同与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双重嵌合。教师教育共同体要真正从“政策联合体”转变为“行动共同体”，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协同与保障，还需要文化层面的认同与价值共鸣。在制度供给上，需要建立跨主体的权责明确、利益共享、成果共评的机制。通过多方共建协议、建立联合理事会等形式，明确共同体各成员在资源投入、课程开发、实践指导、质量保障等方面的权利与义务；通过经费共担、项目联合申报、人才互聘与成果共享机制，增加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密度与合作黏性，避免协同沦为无成本联合或象

征性签约；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估和多主体参与监测，增强共同体运行的透明度和可持续性。在文化适应上，则要超越短期项目合作逻辑，着力培育教师教育共同体的共同价值愿景和使命认同。以立德树人、教育家精神等核心价值为纽带，构建跨机构、跨层级的共同体文化叙事；通过典型示范、案例传播与品牌打造，增强教师教育共同体的身份感与粘合力。在双重嵌合方面，以“尊师”优化教育生态、用“惠师”改善工作条件、借“强师”提升专业能力、凭“严师”把好质量关，从而促使教师教育共同体成为连接国家宏观战略与学校微观实践的关键“中介”，有效承载“十五五”时期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结构优化与创新实验功能。

（三）微观培育：以教育家精神为核心的新质教师塑造

与宏观战略和中观生态相比，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真正落点在微观层面的“人”的生成，即培养怎样的教师、怎样培养教师等问题上。有学者指出，教育质量是教育的生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充分全面发挥人的潜能。“十五五”时期推进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从微观培育层面完成教师专业形态的代际转换，教师教育质量的根本体现，不在于培养了多少合格教师，而在于能否形成一支具有教育家精神内核的新质教师队伍。

将教育家精神作为教师发展的价值支点，培养教育领域领军人才。在强调“高质量发展”的语境中，教师教育的“价值维度”往往容易被技术层面的“效率”“成效”所遮蔽。事实上，无论何种技术、模式或制度，最终都要落实到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选择之上。教育家精神作为一种教师群体共同追求的崇高价值目标，为实现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可以说，教育家精神不仅是一种价值追求，更是一种综合性专业品格与行动逻辑。教育领军人才是教育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参与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其培养核心在于将教育视为关乎个体生命成长与民族未来的事业，以深度的教育信念、敏锐的教育洞察与持续的教育创新，承担起引领学生成长、推动教育变革、参与公共生活的多重使命。在教师教育领域，将教育家精神由抽象口号转化为可感、可学、可评的培养内容与过程机制，意味着教师教育的价值旨归从岗位胜任提升为使命担当，从完成教学任务提升为引领学生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锻造“新质教师”需构筑教师教育核心素养新框架。“新质教师”不仅是相对于“数量型教师”的“质量型教师”，更是在教育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具备面向未来教育核心素养新框架的教师群体。从知识维度来看，新质教师需要具备打破狭义的学科知识中心主义，将教育学知识、学科知识、学习者发展知识与技术应用知识进行系统整合，并有意识地嵌入学习科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等前沿研究成果，使未来教师具备理解学习本质的理论基底和基于证据改进教学的知识；从能力维度来看，新质教师需要具备数字素养、课程领导力、教育研究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人文关怀能力、协同创新能力、全球胜任力等关键要素；从品格维度来看，新质教师应当具备教育理想、社会责任、职业韧性与弘道意识。新质教师教育应以此为参照，构建教师核心素养新框架，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课程设置与实践环节，避免课程碎片化与能力培养的形式化。

深度育人的真实情境，为新质教师养成搭建了实践场景。在培养方式上，要通过深度育人的实践课程，将“教育家精神”的外在要求转化为未来新质教师的内在品质与稳定行动倾向。新质教师的养成离不开深度育人的真实情境历练，应在教师成长全周期构建多层次、多类型的实践场域。在职前阶段，通过多种课程实践方式，让学生在真实或拟真教育情境中、在不断处理困惑和调整实践的循环中形成教育洞察力与改进行动力。在入职阶段，探索导师支持体系，通过联合教研、行动研究与共同反思的方式，使教育实践不再是简单的“见习”“顶岗”，而是教师专业成长的“研究型场域”，把善教者、善研者、善创新者真正推向教师岗位。在职后阶段，通过专业发展学校、名师工作室、教育研究共同体等组织载体，为教师构建富有弹性与自主性的学习生态，使教师能够在真实问题、同行互助与公共讨论中持续实践“教育家精神”。在整个过程中，可以将名师名家的教育案例、改革实践与失败经验纳入学习情境，引导教师对“教育家精神”进行多维度对话与自我定位，从而推动其职业认同从岗位角色走向终身教育者，并逐渐成长为具有教育家精神的新质教师，即在价值上有教育情怀、在认知上有专业洞见、在方法上有数智能力、在行动上有所创新的教师群体。

二、潜在挑战：辨识“十五五”时期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梗阻

在目标图景日渐清晰的同时，必须正视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深层障碍。建设教育强国，已不再是任重而道远，而是“道不远任更重”。未来十年，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是发生在“制度真空”中，而是在既有结构、制度与能力格局中砥砺前行。如果不能深入触及这些关键“硬骨头”，高质量发展将难免沦为“概念上的进步”。本文拟从结构性、制度性和能力性三个维度展开分析，以期析清“十五五”时期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面对的深层梗阻。

（一）教师教育体系有待进一步优化

进入“十五五”时期，教师教育体系改革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何使其充分满足教育强国建设要求，是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首先，教师供给与教育强国战略之间尚未达到充分适配的状态。教师供给总量与结构失配制约着教育强国战略的落实，教师学历层次、专业背景与国家教育现代化、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明显张力，教师培养机构的地理分布、层次结构未能充分响应国家区域协调发展重大战略，制约了教育均衡发展。在需求侧，国家战略对教师教育的差异化诉求，与当前“标准化供给”形成张力。在供给侧，培养体系“同质化”突出，难以回应区域、学段、学科异质性需求。教师队伍将面临结构性短缺问题，当前全国普通高中教师缺口仍达 3.22 万人，STEM 教师等学科师资尤为紧缺，具备融合相关教育理念与技能的教师比较短缺。小规模学校和薄弱学校教师队伍流动率高，呈现整体性超编、结构性缺编的问题。此外，与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区域发展新格局和教育布局调整相比，教师教育供给结构调整相对滞后，缺乏基于人口预测、区域规划和教育需求的动态调节机制，导致教师教育往往事后响应而非前瞻布局。若不通过制度性的结构调整，“十五五”时期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将面临“总量充裕但关键岗位依然空缺”的困境。

其次，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与未来教育形态演进之间的错位可能会凸显。当前，部分高校的师范专业结构依然以传统学科本位、学段本位为主，缺乏面向未来教育变革的跨学科整合与前沿领域布局。诸如人工智能教育、数据素养教育、综合实践活动、STEAM 教育、职业启蒙与生涯教育等新兴领域的师资培养响应迟缓，致使基础教育在面向未来的课程改革中有课程无教师、有需求无供给的现象时有

发生。教师学历结构、学科背景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高层次人才培养要求之间存在明显张力，教师教育在支撑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育等方面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同时，城乡、区域之间教师教育机会获取不均衡的问题还需继续施力。优质教师教育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头部”师范院校和发达地区，边远地区、民族地区和基层学校面临队伍结构优化、岗位吸引力提升、师资供需适配等攻坚难点，难以形成高水平教师教育集群，区域间教师教育质量差异通过生源、培养、就业与发展的链条不断固化，教师教育资源“虹吸效应”显著，并倾向于代际传递，形成“梯度锁定”。尽管特岗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等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地区教师不足的问题，但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许多农村教师依旧难以获得持续、高质量的专业发展机会，优质资源也无法下沉并形成稳定机制，教师教育的“高质量供给”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明显不均匀。

最后，教师教育结构与基础教育改革之间存在节奏差和内容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教育教学创新不断推进，但教师教育系统在响应速度与内容适配方面还稍显滞后。节奏层面，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更新滞后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课堂革命的实际进程，师范生在校学习所接触的教学理念、模式、方法在与职后面临的现实情境之间存在时间错位和情境错位；内容层面，基础教育学校在教师教育体系中的主体性话语权不足，实践育人的环节仍在很大程度上被工具化、边缘化，实践实习学校更多地是在扮演实习接收者、任务配合者的角色，难以成为人才培养标准共同建构者和专业能力发展的共同引领者。由于教师教育体系建构的长期规模化倾向，导致其专业化需求和结构性差异被遮蔽，结果是师范生在校期间形成的教学观念和方法，与入职后面面对的真实课堂和学校文化存在“时差”和“位差”，师范生陷入“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能”的职业起步危机。这些现象表明：若不通过系统性重构打通教师教育与国家发展需求、基础教育改革之间的循环链条，“十五五”时期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将难以实践落地。

（二）教师教育制度有待进一步整合

教师教育制度是构建完善教师教育体系的具体链环，如何最大化地克服政策工具间的不协调现象，为教师教育综合化、一体化改革铺平道路，是未来我国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予以关注的又一话题。

首先,教师教育综合化培养目标与条块分割化的管理体制不兼容。在国家层面,教育、人社、财政等部门在教师培养、资格认定、职称评聘、待遇保障等关键环节的部门协同机制尚未完善,教师教育综合化、一体化发展的制度环境尚未完全形成;在高校内部,师范与非师范院校、教育学科与各专业学科之间长期沿用分割化的组织逻辑,跨学科、跨学段、跨情境的综合培养难以落地。在综合化推进过程中还存在着教师教育边缘化、功利性综合化、借壳式综合化与办学同质化现象,加之师范性与学术性失衡,导致学科知识与教学知识割裂,教师教育综合化改革还不够深入。“大部分师范生培养院校突出其办学的‘学科专业化’和‘综合化’,而忽视其赖以生存的‘师范性’和‘教师专业化’的属性”。师范院校与综合大学在教师培养中协同不足,职前培养与职后发展一体化机制在学分互认、课程衔接等方面存在梗阻。有些师范类院校实际上对教师教育体系更新的动力与积极性不高,教师教育体系趋于僵化,与教师教育新使命、新要求不太匹配,主要表现为治理体系不够健全、培养体系不够完善、协同体系不够成熟、学科体系不够有力、保障体系不够到位等。

其次,教师教育一体化发展制度之间衔接不畅。教师准入、职前培养、资格认定和职后发展本应构成一个完整的制度链条,然而现实中却存在目标不一致、过程不衔接、评价不匹配的现象。教师资格考试与职前培养目标脱节,部分师范生将资格考试视为额外负担,教师教育院校的培养方案也未能充分吸纳资格标准的要求,易导致职前培养应试化倾向暴露;入职后培训与职称评审、岗位聘任联系松散,制度性供给与个体发展需求匹配失衡,导致职后发展成为制度性要求而非内在需求;学分互认、学习成果认证等机制尚不健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师在职前、职后不同阶段与不同机构之间的学习流动和资源共享。与此同时,制度设计在信任与问责之间还存在一定裂隙。一些地方在推动教师管理和教师教育改革中,还存在依赖行政命令和刚性考核的现象,将教师和学校视为“被管理对象”,忽视了其专业主体性与自我调节能力,教师处于高压问责与低度自主的制度环境中,很可能抑制教师教育中本应发挥关键作用的专业自组织力量与内生动力。这些障碍叠加在一起,使教师教育系统在面对高质量发展要求时呈现出决策层理念超前与执行层机制滞后的张力,成为“十五五”时期有待破解的一道难题。

最后，评价机制的“量化偏执”挤压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空间的迹象显现。在高等教育评价体系中，“五唯”评价导向依然存在，教师教育标准体系与质量保障机制尚不完善，科学、系统、以贡献为导向的新型评价体系尚未成熟，难以对高质量的教师培养形成有效引领和刚性约束。教师教育工作者在课程创新、实践指导、学校协同等方面作出的“软贡献”，在职称评审、岗位晋升与绩效考核中难以获得充分认可与激励，教师教育中“重学术指标、轻教育贡献”的问题直接影响着教师教育队伍的稳定与投入动力。许多高校在资源分配时更倾向于支持“可出成果、可拿项目”的学科研究，教师教育与基础教育服务则被视作“附属任务”。在教师教育质量评价层面，也存在一定的“形式主义”倾向。师范专业认证和教师教育项目评估，往往过于强调文件完备性、制度健全性和过程合规性，缺乏以教师专业成长与学生发展成效为导向的多元证据体系，使教师教育改革容易停留在文件层面，难以形成对实践层面的“倒逼机制”。

（三）教师能力素养还难以充分适应变革中的未来教育

未来教育始终处在变革、迭代、升级之中，教师能力素养，尤其是数字素养与课程领导力等必须水涨船高方能与之适应，这是新时期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面对的一道难题。

首先，存在教师数字胜任力危机，综合素养有待提升。在教育智能化背景下，教师教育者对新教育范式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对教育实践的指导力还存在短板，难以在先进教育理论与当下教育实践之间发挥好传导媒介功能。多数教师处于技术应用浅层，缺乏驾驭 AI、解读教育大数据、设计智慧学习生态的“数字领导力”。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冲击下，教师技术整合能力不足，存在技术恐惧与技术依赖的两极分化现象。部分教师对人工智能、大数据、学习分析等技术缺乏系统理解和教育性应用能力，难以在教学设计、课堂互动、学习评价等环节进行深度融合，技术应用停留在“电子化呈现”“形式化创新”层面。教师数字素养存在“使能”困境，在数字技术应用从工具层面的“赋能”向重塑教育生态的“使能”演进过程中，多数教师面临理念、技能与方法的全面更新压力。教师数字素养与教育数字化转型要求之间存在差距，没有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就难以完全适应智能时代教育变革需求。

其次，教师课程领导力存在短板，教育研究能力稍显欠缺。在课程改革和校本课程开发背景下，教师被赋予更高的课程领导职责。然而，部分教师仍将自己定位为课程执行者，对课程整体结构、内容取舍和实施路径缺乏系统思考与自主决策能力；在课程实施中，难以统筹国家课程、校本课程与班级教学之间的关系，课程领导者角色尚未真正建立；在日常实践中，一部分学校的校本课程实践停留在活动堆砌、主题拼接层面，缺乏基于学生需要、学校特色和社会资源的深入开发，基于证据改进教学的课程领导意识与能力有待提升。教育研究能力不足也是教师队伍的普遍问题。研究显示，教师科研创新能力不足，一些中小学教师存在教育教学问题研究意识缺失的现象，对行动研究、课堂观察、实验研究等方法缺乏系统训练。加之受到教育研究学科化、专业化兴起以及技术理性、主体性哲学的影响，现行实践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应有的意义建构属性，呈现出“制作化”的表征。

最后，教师职业精神还需提升，践行教育家精神理应成为教师发展主题。除了外在能力，教师的职业精神结构也被一定程度的弱化，一些教师将教育更多地视作“生计工作”，部分教师存在专业倦怠与变革抗拒，其自我反省能力与终身学习的内驱力不足，影响着高质量专业共同体的形成；教师参与教育公共事务、教育政策讨论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有待于提升，以此使教育家精神所蕴含的使命感、创新性与公共性难以在更大范围内获得现实支撑。这些问题是“十五五”时期教师教育必须直面的关键问题。

三、实践进路：落实“十五五”时期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对举措

在目标清晰与问题透视的基础上，如何构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决定着“十五五”时期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成色与质量。什么是高质量的教育？《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给出明确的关键词：“立德树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科技创新”“拔尖人才培养”“职普融通”“产教融合”“高水平教育开放”和“终身教育”。因此，我国必须从强师赋力、体系重构、铸魂融智三条路径协同推进，以期在宏观治理、中观系统与微观实践层面形成互为支撑、相互嵌合、联动发展的立体式改革合力。

（一）强师赋力，深化强国引领与弹性治理的内涵建设

“强师赋力”主要体现在国家治理层面确立教师教育的战略引领地位，将教师教育系统性纳入教育强国和教育新质生产力生成的顶层设计。

首先，建立以教师教育为支点的教育强国战略布局。“强师赋力”的首要任务，是在国家治理层面重新审视教师教育的战略地位，将其作为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支点纳入统一规划。一方面，以供给侧改革系统规划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即将教师教育牢固嵌入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顶层战略之中，构建清晰的中长期发展路线图和任务书。在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中单列教师教育板块，对教师教育发展目标、任务与改革重点进行系统布局，并明确与教育现代化主要指标相匹配的教师教育监测指标，使教师教育成为检验教育强国建设质量的重要维度。如师资结构优化指数、教师教育质量指数、教师专业发展指数等；另一方面，应将教师教育发展纳入国家教育督导与评估体系，即在对教育现代化水平评估时，将教师教育作为重要子系统进行专门考察，从而在“考什么”与“评什么”上形成政策导向。

其次，构建中央统筹、地方创新与学校落实的多级弹性治理格局。需要以制度弹性消化区域差异、以政策创新激发基层活力，助力新型教师教育治理格局形成。为避免教师教育改革“上热中温下冷”，有必要构建多级弹性治理结构，既保障国家意志的统一性，又尊重地方与学校的情境差异与创新空间。中央层面，通过完善教师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为教师教育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并通过专项计划、重大项目、财政转移支付等工具，加大对紧缺领域和薄弱地区教师教育的倾斜支持；地方层面，结合本地教育发展规划与教师队伍现状，在落实国家要求的基础上开展制度创新，赋予地方政府在教师教育模式创新、制度试验和资源配置上更大的自主权，鼓励建设省域教师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区域教师发展共同体，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案例；学校层面，应在更大自主空间下设计适合自身特色的教师教育方案，提高在课程开发、实践组织与质量评价中的参与度。在这一过程中，应注意防止“政策叠加”带来的负担累积与执行疲劳，注重通过治理简约化与流程再造，提升教师教育治理效能。

最后，完善以信任为基础的教师专业治理机制。“强师赋力”更要体现在对

教师与教师教育者的实质性支持和专业赋权上。一方面，要形成覆盖职前职后一体化的多元激励与保障政策体系。通过奖补资金、职称评价倾斜、岗位设置优化等方式，提高从事教师教育工作的职业吸引力和社会认可度；建立与公务员工资联动的教师薪酬定期增长机制，并构建涵盖心理支持、专业尊严、社会荣誉的多维度激励体系；对承担教师教育主责的高校、实践学校和指导教师，在项目设置、经费投入与荣誉表彰方面给予明确激励，将高质量参与教师教育的行为显性嵌入制度回报机制。另一方面，应构建以信任为基础的教师专业治理新机制，从传统“管控型”向“赋能型”治理转型。在质量保障上，更多地运用过程性、诊断性和发展性评价，减少“一考定优劣”“一评定成败”的刚性评价方式；支持教师专业自治组织、教师发展共同体参与教师教育项目设计、标准制订与效果评估，逐步推动教师从治理对象转变为治理主体。通过这些举措，使“强师赋力”既体现为物质层面的支持，也体现为制度空间和专业尊严的拓展，使教师教育真正建立在“有质量”的支持与“有内涵”的赋权之上。

（二）体系重构，打造循证导向的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

学者对教师教育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师教育体系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教师教育体系的质量评价与改进、职前与职后教师教育体系等方面。面对教育高质量发展任务，需要构建与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教师教育体系，以提升教师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高质量基础教育教师发展体系是在新时代、新理念、新要求下提出的，与传统教师发展体系相比，它更加注重体系的协同性、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教师教育是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的基石，关乎教育强国建设全局，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导性工程。为系统规划“十四五”至“十五五”时期的教师教育发展路径，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实施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就构建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全面提升教师教育质量作出战略性部署。面向“十五五”，深刻领会并全面落实《通知》精神，亟需立足国家战略全局，着力构建以教师职业生涯为主线、以循证改进为内核、以数智支撑为基础的一体化教师教育体系，筑牢教育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首先，构建贯穿教师职业全周期的学习与发展链条。在培养链条上要紧扣“师范性”“强师”和“未来教师”三大关键点，实现教师培养从粗放式、同质化、一般型到精准式、特色化、优质型转变，并彰显各自的优势与特色。为此，应将教师核心素养、教育家精神、数字素养、课程领导力、教育研究能力等要素进行纵向分层与横向整合，使各阶段教师教育目标与内容形成有机整体，并探索建立跨阶段学分互认与学习成果认证制度，使教师学习轨迹可视化、可积累，激发教师持续学习动机。

其次，将学习科学、教育评价学和数据科学的成果深度嵌入教师教育实践。循证教育强调以教学实践证据和研究成果作为教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将该理念引入教师教育领域，有助于打破经验主义与文本主义的双重束缚，使教师教育从经验传承与政策宣讲的结合，走向理论、经验与证据的综合。在课程层面，应以基于证据的有效教学、深度学习、形成性评价等研究成果为基础，构建紧密围绕学生学习成效的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避免教师教育泛理论化或弱实践化的倾向；在评价层面，应从单一的过程合规检查转向基于多元证据的综合判断，综合利用课堂观察、学生反馈、教学实绩、发展性测评等量化与质性证据，形成以教师专业成长轨迹和学生发展结果为导向的质量评价体系，真正将训练有素的反思实践者与研究型教师的培养要求落到实处。

最后，建设开放共享的教师教育研究与数据平台，推动教师教育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与证据驱动。为此，可在国家和省域层面建设教师教育大数据中心，系统整合师范生生源信息、培养过程数据、资格获取情况、入职安置轨迹、职后发展记录等多源数据，形成教师教育行为轨迹；在严格保护隐私与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为政策制定者、学校管理者和教师教育研究者提供数据支持，使教师供给结构优化、教师教育项目评估和制度创新能够在可观测与可验证的基础上进行。同时，应推动师范专业认证与质量保障体系迭代升级，将教育家精神、数字素养、教育研究能力、实践质量等纳入核心指标，强化第三方评估、同行评审和用人单位反馈的作用，构建立足事实、基于证据、持续改进的质量保障闭环。通过这一系列体系重构，教师教育将从静态制度组合转变为动态学习系统，在持续的循证迭代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铸魂融智，驱动价值理念与智能赋能的模式升级

相对于宏观治理和体系重构，“铸魂融智”更直接指向教师教育的价值内核与知识基础，是推动新质教师教育模式生成的关键支点。“铸魂”是教师教育的精神底色，“融智”是推动学习范式与教学组织方式的整体变革，二者协同共促教师自主发展是催生教师教育新质模式的“双驱”。

在价值理念维度，把“立德树人”落实在教师教育全过程。“铸魂”的核心是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内化到教师教育的理念、课程与实践之中。一方面，要在教师教育全过程中系统嵌入价值引领，将教育理想、家国情怀、人文精神和教育家精神培育作为教师教育的“主线任务”而非“辅助内容”。应确保教育史、教育哲学、教育伦理等课程的比例与质量，使师范生能够从历史与理论角度理解教育的本质与价值；另一方面，在所有课程与实践环节中，要有意识地呈现价值议题，使未来教师在不断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过程中形成稳定的教育信念。以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需要国家、社会、学校、教师多方协同，引导未来教师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命运、学生成长与社会福祉相联系，在面对真实或模拟教育情境时主动思考，使“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有尊严的教学、做怎样的人、教怎样的人、为谁教、如何教”等价值议题成为贯穿其专业成长全过程的自觉追问。

在智能赋能维度，以学习科学与技术整合重构教师教育学习形态。“融智”不仅仅是引入技术工具，而是通过把学习科学与智能技术的成果系统嵌入教师教育过程中，重构教师学习与成长的形态。在技术层面，广泛应用学习分析、自适应学习系统、虚拟仿真实训平台等，为师范生提供高拟真、多场景、可重复的教学实践环境，使其在虚拟课堂中进行教学设计演练、课堂管理模拟和个别教育干预训练，在系统反馈中不断修正和优化专业行为；在认知层面，通过引入认知心理学、脑科学、复杂系统理论等视角，帮助未来教师理解学习本质、认知发展规律和群体互动机制，将“为什么这样教”置于“如何去教”的前面，打通知与行之间的逻辑桥梁；在组织层面，探索线上自主学习、同伴协作探究与现场实践反思相结合的混合式培养模式，使师范生在个体反思、同伴互助和导师引领中实现深度学习。

在目标驱动维度，要将驱动教师的自主发展与教师教育培养模式的全面升级作为铸魂强师行动的终极目标。在制度上，教师教育机构要建立基于个人学习账户和发展档案的终身学习支持系统，使教师能够围绕自身发展目标自主规划学习路径，让其在“职前—入职—职后”各阶段的学习成果能够被系统记录和认定；提供“菜单式、学分制、定制化”的继续教育方案，支持教师基于自身优势与职业规划构建独特的专业身份；通过与职称评审、岗位聘任、荣誉评价等制度有效衔接，激发教师将自主学习转化为职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在组织上，要大力发展学习共同体、专业发展学校、名师工作室等多元专业成长载体，鼓励教师在实践共同体中围绕真实问题开展合作研究、反思对话和创新实践，使教师专业发展由培训驱动转向问题驱动和同伴驱动。在文化上，要通过表彰等方式，营造重视学习、鼓励创新的职业文化氛围，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教师教育对话与合作，让中国教师教育更加紧密地嵌入世界教育格局的深度演进与重构进程之中，在吸收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教师教育方案，促使中国从经验学习者逐步转向方案提供者。

总之，“十五五”时期的教师教育，将面对教育强国建设、教育新质生产力生成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推进的宏大背景，其改革成败直接关系着基础教育质量、人才培养质量以及教育公平正义。在此背景下，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既是现有改革路径的延续和深化，更是发展逻辑与制度体系的整体转换。“十五五”时期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面对的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任务，而是围绕教师供给结构优化、教师专业结构重构、教师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等一系列“硬仗”。其不仅是教师教育系统内部的自我完善，更是嵌入国家发展全局的一次功能重组。本文提出的“强师赋力、体系重构、铸魂融智”三条实践路径，旨在打通国家战略与教师教育实践之间、制度供给与能力生成之间、价值引领与技术赋能之间的关键通道，为未来政策设计与实践探索提供一个可供参照的思考框架。

当然，作为一项以规范分析和前瞻思考为主的研究，目前难以穷尽“十五五”时期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所有问题与路径。无论是不同区域、不同类型院校在教师教育改革中的差异化实践，还是数字化、智能化变革对教师专业知识

结构和教育伦理的深刻影响，均有待在未来通过案例研究、实证分析和跨国比较加以深化。特别是以教育新质生产力为导向的“新质教师教育”这一概念自身的内涵厘定、指标建构与测量工具开发，也需要与教育评价学、学习科学和数据科学等领域开展更紧密的对话。在此意义上，本文更希望能为后续政策制定、制度创新与实证研究提供可资参照的分析视角和理论线索。随着“十五五”时期相关政策的逐步明朗，我国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实践将为检验和丰富本文的理论构想提供现实土壤，也将为构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教师教育方案贡献生动案例与中国智慧。

作者信息

龙宝新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师教育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张 倩 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刘来兵

“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的“位”与“为”

来源 | 《现代教育管理》2026年第2期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副秘书长 刘来兵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关键阶段，肩负着承前启后的重大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是“十五五”时期迈向教育发展新征程的关键目标。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贯穿教育事业发展的各阶段，基础教育体系作为一个旨在实现学生全面发展根本目标的、开放的“复杂适应系统”，其质量高低直接关系着教育强国建设的成效。“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面临深刻复杂变局，须以“位”定“为”、以“为”强“位”，方能在基础教育体系变革中守正出新，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奠定坚实基础，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强劲动力。

一、“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面临深刻变局

“大变局带来大挑战，也带来大机遇，我们必须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作用与激荡，机遇与挑战并存。“十五五”时期我国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应当精准察变、积极求变、谨慎适变，以更好地迎接新机遇和新挑战。

（一）精准察变：教育事业逐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十四五”时期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成绩斐然，各级各类教育事业逐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涨较快，达到60.80%；学前教育毛入园率提升最快，达到92.0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分别达到92.00%、95.90%”。从思想引领来看，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上取得新突破，全国中小学思政课专任教师共计70.3万人，近5年增加9.4万人，增幅达15.4%。从教育强国建设来看，高质量教育体系更加完善，教育、科技、人才统筹推进不断深化，教育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新的贡献。“据测算，我国目前的教育强国指数居全球第23位，比2012年上升26位，是进步最快的国家。这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2024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新一轮教育强国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与去年相比，中国在全球的位次上升2位，为第21位，是10年来进步最快的国家。

审视当下，我国教育事业总体发展水平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基础教育在全球范围内是具备优势的。当前，我国已具备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庞大的基础教育体系，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稳居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基础教育普及率总体进入世界中上行列，义务教育在全国县级行政单位全部实现基本均衡发展。当“有学上”成为现实时，人民群众“上好学”的愿望更加强烈，我国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依然道远任重。围绕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的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进行。面对“十五五”时期发展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全球形势，我国应及时察觉教育发展环境的转变，调整教育发展理念，从实现“有没有”转变为追求“好不好”，推动从“教育大国”转变为“教育强国”。

（二）积极求变：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的历史机遇

纵观世界发展历史，大变局通常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和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调整，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特点就是“东升西降”。从国际力量对比来看，西方国家正在走下坡路，东方国家正在崛起，国际力量的东升西降态势不断凸显。从国际秩序维系来看，以七国集团（G7）成员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影响力持续下沉，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影响力不断上升。科技与人才总是向文明程度高、经济发展强、创新要素活跃的地方聚集。大变局深刻影响着世界教育中心的形成与转移，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先后成为世界教育中心。

实际上，世界科学中心和世界人才中心的形成，都需要世界教育中心的支撑。成为世界教育中心，既是我国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的目标，也是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更是世界各国人民利益所系。我们要抓住“东升西降”的历史机遇，在借鉴世界教育中心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本土教育实际，不断发展和完善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使中国早日成为世界教育中心。

从国内发展来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虽然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机遇更是战略性和可塑性。我国教育制度优势明显，教育发展成就显著，教育需求层次较高，人才资源基础较好，这为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提供了充分的内部条件。新时代，我国基础教育应主动适应和服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社会经济发展新格局，注重内涵式发展，持续优化基础教育基本结构，纵深挖掘基础教育内生力量，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推动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我国发布并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教育政策，对提升基础教育质量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和要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三）谨慎适变：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的现实挑战

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需谨慎应对挑战，“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我们就要不断制定新的阶段性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沿着正确的道路往前走”，按部就班地实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人民群众对办强办优基础教育的现实需求对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提出了根本性挑战。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首先应看到人民群众对办强办优基础教育的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尚未健全，城乡区域校际群体教育差距亟待缩小，教育创新能力不够显著，等等。人民群众对办强办优基础教育的现实需求对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提出了多重标准，要求以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进一步发挥基础教育在国计民生中的基础性作用。

打造公平的高质量教育与促进高质量的教育公平对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提出了策略性挑战。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结果看，我国历年排名表现优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4地基础教育质量在全球名列前茅，但从整体来看我国仍然存在乡镇师资力量短缺、校际发展不均衡等教育公平问题。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需兼顾提升教育质量与注重教育公平，促进高质量的教育公平，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对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提出了全球化挑战。全球自由贸易本应是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的纽带和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但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战、关税战频繁出现，全球发展陷入逆全球化困境。贸易战、关税战作为大国博弈的硬对抗主要形式，对教育对外开放的冲击影响深远。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应积极参与全球基础教育治理，深入实施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扩大国际基础教育“朋友圈”，扎实推进高水平基础教育对外开放。

二、“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的战略定位

将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其定位直接影响立德树人任务的落实、国民素质的提升、社会公平正义的促进、教育培养体系的贯通、拔尖

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全球历史变局的应对。“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应明确系统核心目标，发挥系统基础功能，坚定系统价值导向，突出系统结构特性，提升系统发展动力，坚守系统稳定要素。

（一）系统核心目标：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主要阵地

基础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主要阵地，强调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十五五”时期青少年面临价值观多元化、网络文化冲击等挑战，基础教育通过有效传递主流价值观，能够防范不良思潮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基础教育以其在年龄适配性、体系完整性和课程集中性上的优势，其作用不仅在于知识传授，更在于为个体成长埋下“德”的种子，使其在终身发展中具备道德判断与实践能力。从年龄适配性来看，基础教育阶段是个体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塑造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青少年打下的思想品德基础，如同人生的底色，影响深远。青少年在小学中高年级至初中阶段，道德判断能力从“他律”向“自律”过渡，基础教育的系统性德育能够为其奠定终身道德素养的基础。从体系完整性来看，立德树人的要求可以贯穿从学前教育到高中阶段教育全过程，根据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和成长规律，可以设计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育人目标和内容体系。

从课程集中性来看，基础教育通过开设《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等德育课程，能够向青少年直接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观念和道德素养。立德树人不仅局限于德育课程，而且要求融入学科教学、校园文化、管理服务、社会实践等各个环节，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二）系统基础功能：全面提升国民素质的战略基点

基础教育是全面提升国民素质的战略基点，事关国家的发展与民族的未来。国民整体素质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指标。“十五五”时期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而基础教育是这个工程中最广泛、最基础、影响最深远的环节。

从国家层面看，只有基础教育根基牢固，才能培育出高素质的国民群体，为

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持久动力。基础教育不仅决定国家劳动力质量的高低，而且对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产生直接影响。如我国中学生数学、科学学科在 PISA 测试中平均成绩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前列，为高校输送大量 STEM 领域科研后备人才。同时，基础教育能够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从个体层面来看，基础教育覆盖所有适龄儿童和青少年，为每个人一生的学习和发展打下根基，深刻影响着个体未来的发展轨迹和整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第一，基础教育能够在知识与技能方面为学生奠基。基础教育阶段传授的读写算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是个体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础能力。第二，基础教育能够在价值观与人格塑造方面为学生奠基。基础教育位于学生价值观与人格形成的“敏感窗口期”，基础教育可将内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生的人格底层。

（三）系统价值导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环节

基础教育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环节，如同社会公平的起跑线，有助于社会流动的通道更加畅通，有助于社会整体的机会结构更趋公平。“十五五”时期社会公平正义不仅是伦理追求，更是决定社会系统能否稳定演进的核心变量。

“十五五”时期基础教育所培育的理性认知、共情能力与规则意识，恰是抵御不公的最坚固防线。基础教育不仅赋予学生参与社会竞争的基础能力，更塑造着社会对何为公平正义的底层认知。党的十八大以来，基础教育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在此期间，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以及推广人工智能教育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成为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在基础教育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核心关键词。

从硬件层面来看，基础教育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工程”，为贫困地区学校配备教学楼、教材、信息化设备、智能化设备等，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从师资层面来看，基础教育通过实施“教师轮岗交流制度”“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优化教师资源配置，促进区域校际均衡，缓解薄弱地区师资数量不足与质量不高问题。从机会层面来看，基础教育不仅通过普惠性与强制性保障入学权，推动法律机会公平；更通过能力培养标准化、升学通道多元化、文化资本再分配等方式，推动实质机会公平。

（四）系统结构特性：贯通教育培养体系的衔接枢纽

基础教育是贯通教育培养体系的衔接枢纽，强调学段有机衔接，打破学段壁垒，有助于形成“纵向贯通、横向融合”的培养模式。“十五五”时期基础教育的枢纽价值在于以标准化的基础培养为锚点，以灵活的衔接机制为纽带，让教育体系从“分段式铁轨”变为“立体交通网”，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人才需求的动态匹配。从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纵向贯通来看，基础教育能够为高等教育提供张力支撑。第一，在课程体系方面，基础教育通过高中开设大学先修课程、科研实践项目嵌入高中课程、跨学科课程与高等教育专业导论结合等举措衔接高等教育。第二，在人才培养方面，基础教育通过“少年班”模式、“3+3”一贯制培养、“强基计划”等方式衔接高等教育。第三，在评价联动方面，基础教育通过推广学分互认制度、综合评价录取等方式衔接高等教育。

从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横向融合来看，基础教育既能为职业教育注入兴趣驱动的源头活水，也能避免普职分流带来的过早标签化。第一，基础教育通过开设“职业角色体验课”，引入技能挑战项目，能够为学生开展早期职业教育启蒙。第二，基础教育通过综合高中建设改革，强化普职融通，破解普职割裂困境，避免职业教育成为“分流后选项”，让学生在高中阶段即可获得多元职业认知。

（五）系统发展动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根基工程

基础教育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根基工程，只有深耕基础教育这片沃土，才能源源不断地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能够引领未来的顶尖创新人才。从人才成长规律来看，拔尖创新人才的养成并非一蹴而就，也非一劳永逸，而是需要经历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才能取得显著成效。基础教育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入口和起始站。优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应夯实基础教育基点，打牢基础，提高上限，发挥基础教育的筑基作用。

从知识的系统传授来看，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是一个长期过程，其核心素养的种子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已播下。基础教育系统传授核心学科的基础知识、概念和原理，这是构建任何专业领域大厦的基石。青少年没有扎实的知识基础，后续

的深度学习和创新表达将无从谈起。从创新能力的培养来看，充满趣味、启发性的基础教育课堂活动是点燃学生对世界好奇心、探索欲和想象力的关键。基础教育正是想象力与知识共生共长的沃土，拔尖创新人才从来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在适宜的教育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当基础教育能够守护好奇心的火种、搭建跨学科的桥梁、提供试错的空间，那些注定改变世界的创新思维，便会在知识的根基上自然萌发。

（六）系统稳定要素：应对全球历史变局的压舱基石

基础教育是应对全球历史变局的压舱基石，有助于人类在充满不确定性、深刻变革的历史大变局中，既能坚守知识的根基，又能绽放创新的新芽，最终驶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港湾。基础教育已不再仅是个人发展的阶梯，更是国家应对变局的关键，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就是对人类文明延续性的终极投保。

从技术变局来看，基础教育能为青少年数字生存能力筑基，使其在数字洪流中既能破浪前行，又能坚守人文坐标，最终成长为驾驭技术浪潮的时代舵手。基础教育正通过一个个融合技术与人文的教育场景，为青少年植入既拥抱技术又超越技术的认知基因。从生态变局来看，基础教育能为青少年生态文明能力筑基，为青少年植入既尊重自然规律又推动生态系统修复的认知基因。例如：武汉市长春街小学将长江生态保护教育作为学校的办学特色，充分利用校内、校外实践基地的优质资源，为学生提供关于长江生态环境、动植物多样性的科普知识，鼓励学生争当“长江小卫士”，让更多学生成为绿色未来的建设者。从文明变局来看，基础教育能为青少年多元文化能力筑基，推动青少年参与跨文化理解与对话，推动青少年参与全球议题实践，为青少年植入既扎根本土又拥抱世界的认知基因。

三、“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的实践作为

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的核心任务，基础教育的实践作为直接影响整个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水平。基础教育受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综合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人中变化、科技变革和国际竞争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导致其发展变化是缓慢的。基于中国国情教情和国际发展经验，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应

以人口为中心、公平为底线、减负为关键、技术为引擎、开放为保障，才能构建支撑教育强国战略的基础教育新生态，真正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使命。

（一）统筹调配基础教育资源，适应人口流动变化形势

“十五五”时期基础教育正面临学龄人口波动与区域不均衡问题。未来10年，基础教育各学段将陆续迎来生源峰值后逐步下降，同时城乡人口流动加剧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为此，我国正通过各种举措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的教育资源供给。统筹调配基础教育资源，适应人口流动变化形势，是适应人口变化新形势、服务支撑人口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第一，强化基础教育资源的投入和前瞻性配置，扩大优质基础教育资源供给。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结合不同类型区域发展功能定位，科学判断学龄人口变动趋势与教育发展趋势，深入实施扩优提质行动，优化学校布局、调整教师编制、核拨教育经费等。

第二，构建“国家—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教育人口监测预警系统，形成对人口总量变化、结构迁移、空间流动的实时监测网络，在国家层面重点把握人口跨省域流动规律，在省级层面强化市际协调，在市县层面构建精准化学龄人口入学需求预测模型。

第三，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空间布局，重点保障人口流入地区，推动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化。在城市新区、产业园区等人口聚集区优先规划中小学建设，通过政府投资、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增加学位。对人口持续流出的农村，合并小规模学校，集中资源建设乡镇中心学校，保障基本教育质量。

（二）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构建公平优质教育体系

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构建公平优质的教育体系，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目标，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提升国民素质的基础性工程。近年来，我国不断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统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努力办好特殊教育、专门教育。

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构建公平优质教育体系，旨在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第一，提升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普及程度和普惠力度，逐步对经济困难的婴幼儿家庭实施免费托育，逐步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学前教育免费。第二，加快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制调整问题的研究与实验，落实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优化义务教育人力资源配置，有序探索小班化教学改革，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和寄宿制学校，深化弱势地区教育帮扶工作。第三，促进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普通高中入学需要，深入推动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建立一批科学化的普通高中，办好一批高质量的综合高中。第四，实现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要求在人口满足标准的地区至少具备一所正规化特殊教育学校，加快实施残疾学生 15 年免费教育。

（三）持续巩固减负治理成果，满足学生全面发展需求

“双减”（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训负担）政策需要一个落地过程，要久久为功。自“双减”政策落地以来，学科类培训机构大大压减并得到规范，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数量压减 97%，线上压减 87%，大规模的学科类培训无序发展趋势已经基本得到遏制。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长经济和精力负担显著减轻。减负不是简单的“做减法”，而是通过优化教育生态，让学生从“被动应试”转向“主动成长”。2024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持续巩固“双减”成果，全面提升课堂教学水平，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提出：“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

在前期减负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十五五”时期基础教育应持续巩固治理成果，严防负担反弹回潮，切实将“减负”成效转化为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第一，巩固学校教育教学主阵地，让学生在校内必须学足学好。综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加强对学习后进生的课后辅导。压减重复性课堂作业，减少学校考试测试频次。第二，严防学科类校外培训反弹，规范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坚持依法治理与数字化治理赋能学科类校外培训全流程管理相结合，为“双减”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和数据支持。第三，统筹兼顾教育事业发展的深

化教育综合改革，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过度竞争和教育焦虑问题，使不同潜质学生都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第四，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在“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构建贯穿基础教育全链条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四）推动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

“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是“十五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推动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然选择和战略引擎。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近年来，我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步伐不断加快，全域试点应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积极推进基础教育的集成化、智能化和国际化，抢占数智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制高点。在教育强国指数中，我国数字化人力资本得分不断提高。欧盟发布的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I-DESI）显示，在全球约 50 个国家数字化人力资本排名中，我国近年数字化人力资本排名不断提升，最新排名为第 15 位。

站在数字技术重塑人类思维、生活与生产方式的时代浪尖，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家教育改革的战略突破口。第一，以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为关键，以建设国家教育大数据中心、教育专网和算力共享网络为抓手，推进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关键性基础设施升级。第二，以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大规模个性化、创新性教学，探索、推广基于数据驱动和智能计算的个性化学习模式，探索混合式、翻转式、项目式等创新教学模式，从本质上改变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第三，以打造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建设云端学校等为亮点，打造个性化、交互友好的教育智能体，构建智能化基础教育新范式。

（五）扩大基础教育对外开放，提升人才全球竞争能力

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是“十五五”时期贯彻落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要任务。扩大基础教育对外开放，提升人才全球竞争能力，是中国基础教育面向全球历史大变局、适应全球化挑战的必然选择。要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

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推动全球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更多中国力量。

基础教育通过有序、高质量、有深度的开放，在扎根中国大地的基础上，博采众长，能够更好地培养出既具有家国情怀，又具备全球视野和竞争力的新一代人才，为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第一，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鼓励和支持更多中小学与国外优质学校建立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开展师生互访、课程共享、联合教研、线上交流等活动，展示中国基础教育的优势与特色，吸引国际关注，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第二，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将全球议题、多元文化、国际规则等内容系统融入基础教育课程，使学生不仅掌握扎实的本土知识和技能，更具备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全球胜任力以及未来世界所需的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第三，大幅增加基础教育教师海外研修、培训和国际交流的机会，提升教师的国际素养、跨文化教学能力和外语水平；在规范管理和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支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生海外研学与交流活动。

作者信息

刘来兵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
副秘书长

魏梦琦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刘远杰

坚定历史方位与把握历史主动

——“十五五”时期教育强国建设的使命、挑战与方法

来源 | 《人民教育》2026年第5期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共生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远杰

“十五五”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教育强国建设在此历史新征程中的战略先导地位更加突出。“十五五”时期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必须更加坚定历史方位，自觉把握历史主动，全面、系统、深入地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历史主流，深化认识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内涵，科学把握新阶段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使

一、在系统性跃升和质变中深入理解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内涵

教育强国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新方位，从教育大向教育强国转型迈进，是中华教育文明以国家形态赓续积淀的历史结果，也是中国教育现代化改革探索的必然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从教育大国到教育

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教育强国建设就是“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简称《纲要》）明确提出，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是“实现由大到强的系统跃升”。从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谱写了国家教育历史的新篇章；从世界教育格局来看，其实质是新时代人类教育现代化“中国形态”的生动构建。

（一）通过创建“教育强国”话语，实现新时代教育思维与观念的跃升

“教育强国”作为崭新的教育话语被鲜明提出，进而转化为具有中国标识的理论思维、国家战略与改革行动，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独特创举。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以国家名义提出“教育强国”并形成“教育强国建设”的国家行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主张“教育强国建设”，创构“教育强国”话语，实施“教育强国”战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时代意义。“教育强国”深刻揭示出教育发展与国家发展的一体化关系，科学揭示了人类教育以国家形态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教育强国”作为新时代话语，蕴含丰富的理论思维、历史思维、战略思维与实践思维，内在地体现出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理论性与战略性的统一。“教育强国”一经产生与传播，便很快在政策话语、大众叙事与社会实践之间发生广泛而深入的互动，逐步成为国家与人民的集体共识。

（二）教育强国建设正在加速推动教育迈进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与系统性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强”是一个关于质量、能力、价值、影响力的范畴。从“大规模教育体系”转向“高质量教育体系”，这背后是教育发展内在逻辑的整体转变。

从历史逻辑来看，教育强国建设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更加注重赓续中华文明基因、延续中国优秀传统教育思想，真正确立教育事业的文化主体性；进而实现对“西方逻辑”的批判性超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方式构建教育现代化的“中国逻辑”。

从理论逻辑来看，教育强国建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

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直接构成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基础，既是对中华文明教育思想精华的继承发展，是对党在教育领域创新理论的拓展，也是对世界先进教育思想的兼容转化。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构建形成一种科学、先进、统一的教育理论，是确保国家教育事业稳定发展的根本性前提。

从价值逻辑来看，教育强国建设的突出特点在于构建“人民—国家—社会”的核心价值结构。一方面，以新时代人民对公平优质教育的迫切需求为出发点、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落脚点，整体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另一方面，强调教育强国的战略先导性，使教育强国建设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高度统一，系统构建教育强国支撑强国建设的战略逻辑。再者，以教育强国建设扩大社会公平。教育强国建设以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服务全体人民的现代文明素质发展。

（三）教育强国建设是一个不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系统创新教育实践形态、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的历史过程

建成教育强国是一种历史结果与状态，最终必然生动反映在教育实践当中。教育实践的崭新样态即教育实践系统性创新与跃升的结果，是教育文明的新形态：一切以“教育”为名的活动或事物，共同创造“求真向善尚美”且有助于人类进步、社会进步、人本身进步的积极成果，表现为教育实践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教育的物质文明与教育实践的条件要素相对应，教育强国的实践样态是以新时代物质条件为依托，构建公平优质的公共教育资源体系，并得到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高质高效支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体系。

教育的精神文明与教育实践的目的要素相对应，表现为“人民中心”与“育人为本”的根本价值立场的充分彰显，一切教育活动均建立在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之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一切教育活动中深入贯彻落实。教育的制度文明、社会文明与教育实践的过程要素相对应，制度文明显示为教育实践过程中健全而完善的制度化状态，系统性教育制度体系得以确立，教

育治理进入法治化轨道。社会文明显示为教育实践主体全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过程有条不紊而充满活力、法度昌明而富有人文。个人身心健康、积极向上、勇于创新，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互鉴互益。

二、在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科学认识教育强国建设的使命与挑战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构成了新时代国家整体事业发展的历史主脉与根本主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一方面要承前启后，巩固好“十四五”时期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另一方面要应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发展环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的历史突破。

（一）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是“十五五”时期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使命与主要挑战

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纲要》进一步将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作为总体目标。“十五五”时期教育强国建设必须与中国式现代化深度融合，教育强国建设目标只有通过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实现。

教育“由大到强的系统跃升”的发展目标能否实现，根本上就是看教育强国建设能否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全面契合。教育强国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于“全面”二字：教育功能与价值的全面发挥且全面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达成。

历史地看，教育的基本功能一般体现为经济功能、政治功能、人口功能与文化功能。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迅猛迭代，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面重塑人的生产生活；国际政治秩序复杂多变；现代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生产力跃升的历史方向；人口少子化、老龄化趋势不可逆；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需求越发强烈。这一系列社会变迁提出重大信号：必须立足历史实践的变化与人民的新需求，重新审视教育的功能和价值定位。

从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出发，一是要从经济、政治、人口、文化的历史变化趋势中重新阐明教育基本功能的内涵与意义；二是要突出教育的“生态功能”，构建教育的“五功能”结构。全面服务就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与内涵，形成教育强国建设的功能体系：教育人口功能的使命是服务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教育经济功能的使命是服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教育文化功能的使命是服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教育生态功能的使命是服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教育政治功能的使命是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内涵极为丰富，一切价值又都是围绕“人”这个根本尺度而展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它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蕴含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及其伟大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结构中，“促进世界现代化、发展国家现代化、推动社会现代化，最终落脚点都在于实践人的现代化”。正是这个“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逻辑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历史性超越。

因此，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使命与主要挑战，实质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如何与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价值对应与价值统一，通过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价值目标，科学构建教育强国的价值体系与目标任务。特别是教育强国如何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重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尺度的教育价值体系与目标体系。

（二）着力战略全局、经济趋势、时代变局与关键节点，是“十五五”时期教育强国建设重大使命与挑战的基本方面

202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深刻把握当前和未来五年教育面临的新使命新挑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把教育强国建设放在国家战略利益和目标的发展全局中来把握、放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中来谋划、放在世界百年变局的深刻演进中来推进、放在破旧立新和蓄势突破的关键节点中来提升”。这些判断的依据来源于教育强国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使命与基本目标，同时也来源于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挑战。

第一个“放在”突出战略眼光与战略思维，关键词是“战略全局”。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国家战略协同发力与系统支撑。教育强国建设作为战略先导，必须全面构建与整个国家战略体系的战略关系，回应国家不同战略需求，全方位培养战略人才。

第二个“放在”着力在“教育与经济”的基本关系及其时代变化中重塑教育，把教育强国建设置于新经济形态及其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之中，核心是必须培养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质人才”，重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人力资源质量与结构。

第三个“放在”突出强调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意识与思维方法，关键词是“大变局”。一是强调要在历史新方位的意义上认识和定位教育强国建设的文明意蕴；二是强调教育强国建设要以“大变局”为认识论与方法论，“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三是强调教育强国建设须在历史大变局中把握历史主动性，以教育强国建设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第四个“放在”实则是进一步明确“问题导向”与“深化改革”的方法论意义，关键词是“关键节点”。“十五五”时期教育强国建设进入实质性攻坚阶段。经过“十四五”发展，我国教育现代化总体水平已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规模优势已经确立。当前的核心任务是从“有学上”转向“上好学”，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这一转变必须通过“破旧立新”打破旧有的路径依赖。同时，教育领域仍存在一些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顽瘴痼疾：需要进一步破除“五唯”评价顽疾，建立科学、多元的教育评价体系；需要破除人才培养模式滞后问题，打破学科壁垒，推进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创新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需要通过制度创新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教育公平，让优质教育资源更加普惠。教育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赢得战略主动的关键因素。当前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技封锁和人才争夺加剧。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通过基础研究和高水平人才培养为国家战略安全“蓄势”。“十五五”时期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期。教育需要提前布局未来产业所需的人才链和创新链，通过学科专业调整和优化，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实现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突破。面对少子化、老龄化等人口结构新趋势，

教育体系要主动求变，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挖掘人口质量红利，以“人才红利”替代传统的“人口红利”。

因此，将教育强国建设放在“破旧立新”和“蓄势突破”的关键节点，是中国教育由“大”变“强”的必由之路，也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先手棋。

三、在直面使命与挑战的历史主动中正确把握教育强国建设的逻辑与方法

“十五五”时期教育强国建设的使命与挑战，集中在如何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地处理好教育强国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上，具体而言，就是如何真正做到“四个放在”并与“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形成整体呼应。因此，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围绕历史与时代、国家与人民、理论与实践等重大关系，科学把握教育强国建设的逻辑与方法。

（一）树立大历史观，正确把握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规律与根本遵循

大历史观是正确看待和推动历史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的大逻辑大趋势。”教育强国建设是国家战略与人民实践的统一，是国家教育历史的重大转型，因而须以大历史观认识和把握其发展规律与历史必然性。

一是要从几千年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认识和把握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方位。古代中国教育的优秀传统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文明根基，近代中国教育辗转探索的百年积淀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宝贵经验，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基础与历史动力。

二是要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视域中把握教育强国建设的历史关系，始终把教育强国的历史目标同国家整体战略目标、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紧密结合起来。

三是要在世界教育强国格局中定位中国教育强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必须围绕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构建起包含人民关切、天下情怀与生态精神的发展逻辑与价值体系。

（二）深化认识和科学把握“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方法论意义与时代内涵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为根本问题导向，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突破，为建成教育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与民心根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反映在教育上就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更加多样的教育需求。因此，必然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和科学把握“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方法论意义与时代内涵。

正确把握“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首要前提是科学理解“人民”的内涵。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由人民创造，人民同时也是历史进程中的人民。伴随实践创新发展与历史进步，人也在不断变化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的“人民”必然展现出人民发展的新时代特点。

“十五五”时期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根本科学基础，在于准确把握“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内涵与特征。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标志的产业变革，全面重塑着人民的生产生活与生命样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民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需求发生巨大转变，人民本身也在发展和进步。人与自然、人与劳动、人与人、人与文化等人类基本关系均已发生深刻变化。新时代的人民有着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一样的现实需求和发展状态。因此，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然要求深入了解新时代人民的发展性、新需求与新特点，确保教育改革创新更合目的、更合规律。

（三）构建教育治理新格局，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牢固的制度支持

新时代以来，国家通过不断推进教育治理能力与体系现代化，有效保障了教育大国的构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的民生基础与人力资源储备。“十五五”时期推进教育强国建设，须更进一步提升教育治理能力与现代化水平，为教育强国建设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教育治

理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实现过程与结果的整体善治。以人为本，即是以人的价值作为教育治理的一切价值之源。教育治理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以人为本的教育治理，在过程上要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充分发挥人的治理能动性；在结果上体现为紧紧围绕人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构建科学的治理体系。

教育治理要坚持系统观念，实现系统治理。一是教育治理要将教育本身作为一个系统加以对待；二是教育治理要跳出教育系统，把教育放在社会大系统中认识和考察。

教育治理要切实触及教育的深层实践问题，实现深度治理。教育深度治理意味着教育治理的触角深入到一切教育场所与教育活动，确保教育公共资源的全覆盖、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构建贯通式治理体系，深入到每一个家庭、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教育主体。

教育治理要充分发挥主体责任与义务，实现协同治理。协同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发展的基本取向。教育协同治理，主要是政府、学校与企业的协同，家庭、学校与社区的协同，以及教育理论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的协同。治理过程中，关键是要突出政府的方向主导地位、学校的实践主体性、家庭的文化源生作用、企业的人才检验评价功能与社区的公共环境育人价值。协同治理以“求同”为目的、以“协作”为方式，构建多场域、多主体分工协同育人的基本生态。强调教育理论者与教育实践者的协同治理，促成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和转化，善于将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逻辑转化为广大实践者乐于接受的生动叙事。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23 年度教育学重大项目“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研究”（编号：VAA230006）的研究成果】

“一会两中心三院” 2026 年度工作计划部署会成功召开



2026 年 3 月 5 日下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生活·实践教育专委会、陶行知国际研究中心、武汉市生活实践教育中心、长江教育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海南自贸港陶行知国际教育研究院（以下简称“一会两中心三院”）2026 年度工作计划部署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成功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来自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长江教育研究院、“生活·实践”教育共同体、湖北教育出版社、湖北科技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武汉市教育电视台等相关合作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和研究生代表参会。

会议由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陶行知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生活·实践”教育实验发起人周洪宇主持。会议伊始，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长江教育研究院和“生活·实践”教育共同体代

表分别汇报了2026年度重点工作计划,明确了各单位新一年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

随后,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申国昌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方平,湖北长江教育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张华英,“生活·实践”教育共同体秘书长刘来兵教授,汉川市教育局原党组副书记张建安等先后发言,围绕重大课题研究、重点图书出版、教育智库建设、学术活动筹办、教改实验推广、人员资源统筹协同等方面展开深入研讨,为2026年“一会两中心三院”的发展规划擘画蓝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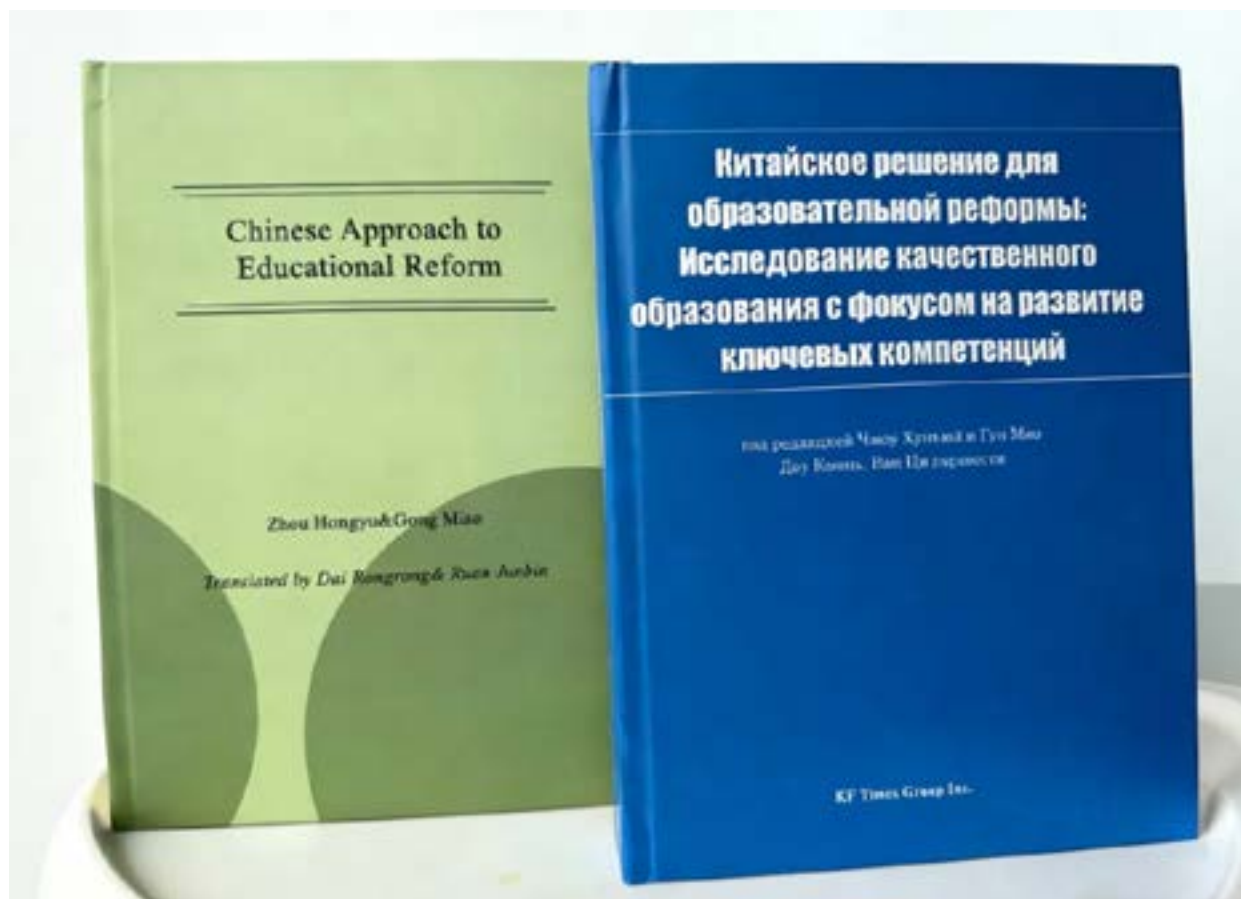
交流讨论环节,来自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温州大学、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信阳师范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湖北科技出版社、武汉市教育电视台、甘肃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一会两中心三院”的协同工作机制及其他多项重点项目展开热烈讨论,为年度工作的顺利开展建言献策。

会议最后,周洪宇院长做总结讲话,他提出“高站位布局、低重心落实、大团队协作、强力度推进”的二十字工作方针,并强调要加强八个方面工作:加强协调指导、加强资源整合、加强理论研究、加强实验推广、加强宣传出版、加强产品研发、加强国际合作、加强重点督办。“问题就是答案,难题就是机遇,困难就是创造”,会议最后,周洪宇院长鼓励大家顺势而为、抓住机遇、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确保2026年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为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治理研究共同体贡献力量。

本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一会两中心三院”2026年度各项工作全面启动,为各单位凝心聚力、开拓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多语种外译出版：中国原创教育理论走向世界

近日，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兼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教授的学术著作《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英文版、俄文版正式出版，这是“生活·实践”教育理念与实践的首部外译著作，同时也是周洪宇教授的第7本学术著作外译本，彰显着中国原创教育理论正逐步登上国际舞台，为全球教育改革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由江西教育出版社于2022年首次出版，是国内首部全面系统介绍核心素养理论及其全球传播的学术专著。该书不仅深入梳理了核心素养理念在世界各国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实践历程，更以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为根基，创造性提出“生活实践”教育六大理念和“六力论”主张，为素质教育探索提供了

全新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书中特别收录了2018年至2021年期间湖北、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实验学校的优秀案例，以鲜活的实践成果验证了理论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有机统一。该书出版后迅速启动外译工作，目前已完成英文版、俄文版的翻译出版，其它语言版本也在稳步推进中。这一多语种外译布局，体现了主动向世界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的学术自觉，也是推动中国教育学“走出去”的重要尝试。



在此之前，周洪宇教授已有多本学术著作陆续外译出版。CHANGING THE WORLD THROUGH EDUCATION: THE LIFE OF TAO XINGZHI (《通过教育改变世界：陶行知传记》)、LIFE EDUCATION——SELECTED READINGS OF TAO XINGZHI’S ENGLISH WORKS (《生活教育：陶行知英文作品选读》)、A STUDY OF EDUCATIONAL GOVERNANCE IN CHINA. (《中国教育治理研究》)、ACADEMIC NEOFIELD AND PARADIGM TRANSI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学术新域与范式转换 — 教育

活动史研究引论》等英文著作分别通过美国时代出版公司、W.S. HEIN 出版社、SPRINGER NATURE（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等国际知名出版机构进入海外主流学术渠道。其中，《世界教育大师：陶行知》《中国教育治理研究》（英文版）分别入选 2018 年及 2021 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陶行知大传：一位文化巨人的四个世界》入选 2022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推荐书目。

长期以来，周洪宇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围绕陶行知研究、教育史研究、教育政策与治理研究、教育理论研究、教育实践经验五大研究领域，坚持“专著化、通史化、教材化、大众化、国际化、应用化、数字化”七化的工作思路，系统布局、稳步推进。此次《教育改革的中国方案》外译本的出版，正是周洪宇教授团队长期推进学术研究“七化”战略的又一重要成果。

据悉，团队今年陆续还将有 4 至 5 本著作外译本在海外出版发行，涵盖英文、葡萄牙文、韩文等多个语种。这些外译著作的集中推出，将进一步扩大中国教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外译著作的集中推出不仅是对个人学术成果的肯定，更是中国教育学界向世界贡献教育智慧的重要体现。从陶行知研究到教育治理探索，从教育史挖掘到当代实践创新，周洪宇教授团队以扎实的学术研究和系统的国际传播，正在向世界展示中国教育改革的深度思考与实践方案，为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积极贡献。

“三师课堂”写入多地教育年度规划， 全学段全学科探索引发关注

近日，全国多地陆续将“三师课堂”纳入年度教育重点工作部署，标志着这一教学模式正从学校层面的局部探索，向区域层面的制度化、体系化推进，为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变革提供了实践路径。

西安市 2026 年教育工作要点明确将“推进‘人工智能+教学’工作，进一步探索‘三师课堂’融合路径”列为“深化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含中职）全学段推进“三师课堂”实践。通过开展项目式学习、跨学科主题学习、思维型教学、STEAM 教育等活动，推动教学方式变革，让不同学段的学生逐步体验“教师——小先生——AI 智能师”三元协同的新型课堂模式。同时，“三师课堂”将覆盖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体育、科学、艺术等所有学科领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探索“师——机——生”三元协同的未来课堂新路径。

与此同时，武汉市硚口区在年度教育教学改革部署中，同样将“推广‘三师课堂’教学模式”作为深化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抓手。提出以“好课堂、好作业、好课后服务”为抓手，深化中小学“四有课堂”实践，持续巩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成果。

从西安到武汉，两地不约而同将“三师课堂”纳入区域教育发展布局，充分体现了这一教学模式在推动课堂教学变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的实践价值，也为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育教学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样本。

这一系列探索，是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精神的深入贯彻落实，是对教育部探索构建“师——机——生”三元协同未来课堂最新要求的主动响应和生动实践。“三师课堂”作为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变革的创新探索，正成为推动育人方式深度转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抓手，为建设教育强国贡献来自课堂教学一线的实践智慧与创新力量。

长江教育研究院举办政策咨询报告撰写专题讲座



2026年3月19日下午，长江教育研究院在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会议室举办政策咨询报告撰写专题讲座，邀请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付卫东作“如何撰写政策咨询报告”学术报告。本次培训旨在提升研究院智库建设与资政建言能力，精准对接教育决策需求。

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秘书长、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申国昌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副秘书长、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刘来兵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武汉工程大学黄艳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育学院院长张炜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湖北长江教育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张华英等出席活动。

培训伊始，周洪宇院长阐明本次活动的核心目标，结合当前“双一流”建设要求，强调政策研究与咨政建言对高校学科发展和个人多元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指出高质量政策咨询报告是智库发挥决策参考作用的关键载体。报告会由中国昌教授主持。

付卫东教授从九大维度系统讲解政策咨询专报撰写的核心要点、方法与实操要求，内容涵盖政策咨询报告的内涵、撰写意义、核心特点、主要种类，厘清咨询报告与学术成果的区别与联系，明确撰写所需能力，总结八大诀窍，并结合四份实际案例展开实操细节分析，最后提炼七点启示，为参会人员提供全面且具体的撰写指导。

中国昌教授在总结中指出，本次培训实现了研究与咨政、理论与实操、宏观与微观的深度结合，为研究院研究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咨询报告撰写课。

周洪宇院长从决策者视角作补充发言，与付卫东教授的专业视角形成互补，重点梳理领导对政策咨询报告的核心需求，介绍政府工作机制与报告审阅特点，以及调研报告、资政报告、资政专报的不同篇幅要求，提出专报撰写的关键实操要求，并阐释人文社科基地、智库的五大工作任务与责任，为研究人员从决策需求层面把握专报撰写要点提供关键指引。

本次专题培训精准对接长江教育研究院和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以下简称“两院”）的智库建设与资政建言工作实际需求，系统梳理专报撰写的思路、方法与实操规范。下一步，“两院”将持续开展系列能力建设活动，将专业要求转化为工作实效，不断提升资政建言质量，切实发挥高校智库的决策参考与智力支撑作用，为教育政策科学制定与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喜报！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教授论文入选 2025 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优秀论文

近日，2025 年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优秀论文评选结果揭晓，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陕西师范大学全球教育治理与智库研究院院长周洪宇撰写的学术论文入选。

此次入选的论文题为《在“共学、共事、共修养”中砥砺品格担当重任——兼谈新时代博士生核心能力发展的六维向度》，刊发于《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5 年第 9 期。论文立足新时代博士生培养实际，系统提出博士生核心能力发展的六维向度，深入阐释“共学、共事、共修养”育人理念，为高校优化研究生培养体系、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参考路径。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管、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主办的国家级核心期刊，属 CSSCI 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 A 刊核心期刊，是国内研究生教育领域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

本次评选范围为 2025 年度发表于该刊的 132 篇文章。经综合评审，最终确定 10 篇优秀论文。

2025 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优秀论文（按发表刊期排序）				
序号	标题	作者	单位	刊期
1	一流大学的责任与目标	陈平原	北京大学	2025(1)
2	研究生要学会研究	李言荣	西北工业大学	2025(3)
3	“盲审”还需“明辨”补：博士学位论文 评审机制反思	董云川 刘静	云南大学	2025(4)
4	导师立德树人成效评价的两难困境及破解 之道	毛金德	汕头大学	2025(4)

5	构建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常态化监测体系	郑庆华	同济大学	2025(5)
6	研究生教育质量文化的偏失与匡正	袁广林	郑州西亚斯学院	2025(5)
7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我国研究生课程教学目标的升级	别敦荣	厦门大学	2025(6)
8	中国特色交叉学科评价：包容性、发展性评价理念与运用研究	林梦泉 王鹏 廖婧琳 肖文英 黄俊平	北京理工大学	2025(6)
9	在“共学、共事、共修养”中砥砺品格担当重任	周洪宇	陕西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25(9)
10	人工智能赋能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矛盾解构与智慧变革路径	邓方 陈晨 何洪文 王晓庸 刘欣 陈禾	北京理工大学	2025(9)

此次获奖是研究院学术建设的重要成果。长江教育研究院将以此为契机，坚守学术初心，聚焦教育强国建设核心任务，持续产出高质量学术成果与智库报告，为推动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教育治理研究》的征稿通知

随着国家对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重视，提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已日益成为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为顺应此教育变革大趋势，促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创刊于 2015 年的《长江教育论丛》已从 2022 年起正式更名为《教育治理研究》，并顺利出版和上线知网。

《教育治理研究》（半年刊）由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长江教育研究院联合主办，致力于成为以教育治理研究为主题和特色的集刊，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AMI）核心集刊。著名教育家、原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顾明远教授担任本刊顾问。朱永新、徐辉、张力、王定华等一批全国知名教育专家组成本刊编委会。

（一）主编介绍



《教育治理研究》主编周洪宇

周洪宇，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二）投稿须知

1. 征稿对象：关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的知名学者、教师、专业研究人员、管理人员等。
2. 栏目设置：卷首语、特稿、习近平总书记教育思想论述、教育治理学研究、人工智能与教育治理、教育舆情监测与教育治理、基础教育治理、高等教育治理和有关专题等，出版时根据稿件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同时，我们特别设立“青年学者专栏”，致力于发表年龄在35岁左右的青年学者及优秀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论文，每期力争2-3篇，以凸显本刊特色。
3. 内容要求：选题新颖、数据可靠。鼓励就教育治理领域某一主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篇幅在1万字左右为宜。
4. 稿件来源：全国征稿，匿名三审。投稿邮箱为 jyzlyj@126.com。
5. 截稿日期：2026年第2期截稿日期2026年9月30日；2027年第1期截稿日期2027年3月30日。
6. 学术规范：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勿一稿多投。本刊审稿周期为二个月，二个月未收到回复可另投其他刊物。

（三）体例格式

1. 基本要件：论文标题、作者署名及简介、摘要与关键词、正文、注释、参考文献。如涉及资助项目，请注明项目来源、名称和编号。
2. 论文标题（不超过20字，中英文）。
3. 作者署名及简介：作者署名一般不超过4人；作者简介包括姓名、性别、籍贯、所获学位、任职机构（正式全称）、职务/职称。
4. 摘要与关键词（中英文）：摘要须独立成篇，完整、准确地概括文章的实质性内容；关键词一般不超过5个。且中英文应相互对应。

5. 正文：①标题一般分为三级，第一级标题用“一”“二”“三”等标示，第二级标题用“（一）”“（二）”“（三）”等标示，第三级标题用“1.”“2.”“3.”等标示；②图、表和公式均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如图1、图2和表1、表2，以及（1）（2）等。图和表应有简短确切的题名，图号图名应置于图下，表名表号置于表上，公式号置于右侧。

6. 注释、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为“顺序编码制”，采用页下注形式，除电子文献外其余均需标记页码，作者需保证文献的真实出处，如有需要编辑部会请作者提供引文原文。具体格式，参照引用性注释采用《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7714—2015）。



长江教育研究院是在湖北省教育厅的支持下，由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发起，于 2006 年 12 月 16 日成立的教育研究机构。由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03-2023），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担任院长。

长江教育研究院本着“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的指导思想，“民间立场、建设态度、专业视野”的立院原则，聚集了一批国内外优质教育专家资源，搭建了一个以文化出版企业为依托、联系相关教育专家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平台，形成了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政策研究为重点、出版企业为依托、政府支持和社会参与为支撑，“学、研、产、政、社”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的新型体制机制。

多年来，长江教育研究院一直致力于打造新型教育智库“重器”，努力让智库的“谋划”转化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智库的“方案”转化为实际行动，智库的“言论”转化为社会共识，更好地为改革奉献力量。自 2016 年来，连续三年在中国智库索引评选中社会智库类排名稳居前三。2017 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2017 年度中国核心智库”。



联系电话：027-87671389

官方邮箱：changyanyuan@qq.com

官网地址：<http://cjyy.com.cn/>

公司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 268 号省出版文化城 B 座 6 楼